

李絜非 編著

浙史紀要

正中書局印行

浙 史 紀 要

李 絜 非 編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浙史紀要自序

作者以研究中國近代史而特別有興會於近代中日間之關係的觀點而言中國各省浙江應最值得重視。中國自趙宋以降，浙江一隅，誠如朱子所稱：「豈非閩越反居天下之中？」直至今日蓋猶然。浙江之開發與儼然成爲國之中心，實緣外患而使然。讀浙江近代史實，輒令人感奮無似。作者以浙江爲第二故鄉，播遷之餘，感書生百無一用，因勉以文史代戈矛，發憤寫中國各省史事，一以鼓舞各省人的士氣，一以規知其間祖功宗德的辛勤，與夫對外關係的經過，曾以六閱月之力，成東北、滇、浙三種小史，會以事故中止，迄今憶起，猶復惘惘不置。

浙江之開發，以漢族歷史的記載言，雖遜中原一籌，然古代遺跡往往而存。戰國時，越雖曇花一現，勾踐後似寂然無聞，然秦有會稽刻石，漢武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人，江南枳梓竹箭，吳王擅鄞海澤。其後水利日修，浙土漸闢，晉孝武帝除三吳租布詔有云：「三吳奧壤，股肱望郡。」梁邱遲永嘉郡教，謂永嘉「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郡之區會。」

白居易盧元輔，除杭州刺史制有云：「江南列郡，餘杭爲大，征稅猶重，疲人未康。」樓鑰未待問知湖州制謂：「吳興劇郡，視古左馮。」晁補之、王十朋、王炎湖州到任謝表，先後有「肱股佳郡」與「茗嘗之間，湖山清遠，而今此京畿之內，事物浩穰。」蔡肇明州到任謝表：「眷甌粵之偏陬，控東南之美浸，鯨蛟霧濕之所蟠鬱，夷棘剗舶之所往來。」大抵南宋之時，浙土之美，遂大見於世。

民國二十六年由蘆溝橋事變而淞滬血戰，暴敵登陸浙土，遂起全面抗戰。按乍浦一隅，明末倭寇內犯，均由此登陸，一八四〇——四二年間，英人亦屢攻乍浦，遊者謂古代烽火土阜，防禦遺跡，猶可辨認。降及清末，猶致力於此間的海防。不虞倭寇孽嗣，不忘舊惡，猶得恣其兇饒。溯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二一〇年），在鄞縣（今寧波）時遣方士徐福，將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吳大帝黃龍二年（西元二〇一年）正月遣將軍衛桓將甲士萬人，自會稽浮海求夷州及亶州。雖蓬萊、夷州、亶州之所在，甚多爭論，而所指要皆在日本島國的方位則無可疑也。其後中國文物制度，貿易交通，多由寧波輸日。湖五代時，倭以商業的關係，與吳越錢氏相往還，宋代倭船來者益多，因置提舉市舶司。乾道九年（西元一一七三年）後倭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然盜竊行爲，自古既然，而浙省之受害爲烈。浙產的處州烏剛白檀之炭，可以鍊鋼，輸日不少。而溫屬弗石，沿海漁產，皆大利於日本。以

文化言，佛教王學，影響東瀛最深，日人威畏而不懷德，侵浙率先且甚，翻閱史冊，良復令人倍憤。

此次我國抗戰軍興，不五閱月，杭州及浙西各縣，即告淪陷。其後歷年敵人之迭次竄擾及侵佔，依浙江善後救濟資料調查報告（三十四年十二月編印）所稱：「總計八年來，為敵侵佔盤踞較久者，有杭州市、杭縣等三十八市縣，縣境為敵一次或數次竄擾者，有臨安、新登等三十縣，縣境未受擾及者，僅龍泉、慶元、景寧、泰順、淳安、仙居等數縣而已。此外遭敵機空襲者一、一五六次，投彈一、七六八枚，即龍泉、雲和、景寧、淳安等縣，亦受損害。敵軍在本省流竄次數特多，故損失亦特重，其中生命財產，以及交通農工各業之損失，分別略舉，計房屋燬損，估計約在七三二、九〇〇間，農業方面，耕作面積損失一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耕牛十萬頭。工業方面，計織維工業、手工業及其他工業，損失三九、二四〇、八〇五、〇〇〇元。交通方面，陸運破壞公路二、七七〇公里，縣道破壞二〇、八三〇公里，各種公私汽車，損失五二三輛，手車九、九一三輛，水運損失船舶二九、二四六隻，汽船六〇隻。糧食方面，損失公有糧食二四五萬石，民有糧食二、五〇〇萬石，至因災害而減少產量，其數當在五六、〇〇〇萬石。醫藥衛生方面，遭受破壞之公私醫院衛生材料廠衛生試驗所共計一九二單位，病床三、四〇〇張，被迫停辦者九七單位，病床一、五〇〇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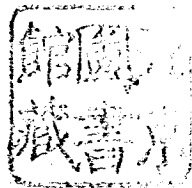
其他漁業，損失漁船一六、〇〇〇艘，桑園損失約一百萬畝，水利海塘工程之損失，尤爲鉅大。綜上各種損失，其數字已屬可觀。而文化教育事業及機關團體之損失，尙未計及。至民間之直接損失，幾於無法以數字計算，而難民之急待救濟者，最低人數當有一、七五七、五二五人。視明末倭禍的慘重，其損失尤當倍蓰。我人當茲勝利之餘，故土重光，居勾踐沼吳與國之鄉，對東土一葦可航之地，安不忘危，痛定思痛，有感而刊印本書，不無可以獻替於國人者在也，並爲之序。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誌於杭州浙江大學宿舍。

第一章 緒論

「越」與「浙江」命名的由來

浙江古名「越國」，衛聚賢釋義爲：「越卽鉞字，爲斧鉞的鉞。近在浙江境內的古蕩，良渚和錢家漾，皆有石鉞發現，是鉞爲浙江古民族所發明。」「於越」，依衛氏釋：「卽虞越，亦卽吳越，吳越原係一個民族，後越人發明鉞而獨立，故越有超越之義，言越人發明鉞，而武器超過吳人。」此可以備一解，尙不能視爲定論。大抵秦漢稱蠻曰越，古人常聯用「胡越」二字爲一辭，以中國的北方之人爲胡，中國的南方之人爲越，所以越係種族的名稱。惟史記稱越，漢書則改稱粵，又作繇，皆一聲之轉。更由以知道越係一普通名辭，爲中國南方異部的通稱。今浙江簡稱曰越，乃係以種族之名名地方。至於「浙江」一辭，原爲水名。虞喜志林云：「潮水投浙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瀉，水勢折歸，故云浙江，一名浙河。」肖其山峻水瀉，經流曲折，故名。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浙河，一名曲江。」



史記云：「秦始皇渡浙江至會稽。」則浙江的由來既久，然自水名而漸引用以爲地名，則始於通典：「元帝渡江，揚州爲王畿，領東浙江地。」唐時設浙江東西道，宋時遂有兩浙之稱。原浙江一省，既大抵在浙江流域，而狹義的浙江流域，又開發最早，故以水移稱地域，爲有其實際的關係，自易假借。於是水則改稱爲錢塘江，而以浙江稱古越之地，越則用爲簡稱，今既不以指國，亦不以名種族（按百越族今已同化於漢族殆盡）。

浙江的古今民族

史記越世家，謂越係夏禹的後人，到了春秋末年，允常勾踐始興，此係中原人士夷狄用夏則夏之的意思，而在古越人本身，藉此託古之辭，以自高其身價，由考其文化生活情況異於中原一點足，以覘之。其時越以百稱，則其族類之隱夥可知，所居之地，分布亦很廣袤。呂思勉謂：「自淮以北皆稱夷，自江以南則曰越。」越自勾踐後，不數傳爲楚威王所滅。至於秦漢之際，復於浙江建甌越國（說者謂同時建立之閩越國，亦在浙江），甌越閩越二國君長，皆號爲勾踐之後，然在漢時，常相自闕，漢武帝先後兩度徙其民於江淮間，當然早同化於漢人。史稱其原住地，遂虛，然中多山林，至三國吳時，

古越的遺民，重新以「山越」之名叛吳，爲吳所平。嗣後因爲中原漢族大批陸續南下，古越的遺民，一部分更南移，一部分遂漸歸於漢化。至於今日，浙南景甯等處的畬民，亦爲南蠻後裔。但考察者謂今浙南的畬民，非古代土著，乃明末由廣東等地經福建遷來的。史圖博李化民於所著牧木山畬民調查記一書，卽主之，並定爲一五八五年至閩之一部分，移至浙省，以抵於今之景甯縣。並稱此子遺的畬民，已在潛移默化之中，遂漸漢化，其人數依民國十八年九月浙江民政廳的調查：景甯最多，一七、四〇〇人，遂昌次之，六、〇八五人，依次爲麗水六、〇〇〇人，宣平四、九〇五人，平陽三、六〇〇人，龍泉三、〇〇〇人，青田二、〇〇〇人，松陽一、一三四人，共四四、二〇六人。有鍾、藍雷三姓，傍山結茅，務耕作，自耦其羣，不與漢伍。清嘉慶八年，浙江巡撫阮元，爲言於朝，許處屬畬民一體應試。民國以來，國內各族一律平等，其漢化必將加速無疑。

春秋之世，吳越已通於中國，及至楚滅越國，越人南嚮，江淮間人必有移居於今浙西地方的。秦始皇統一天下，會稽設郡，但其時地廣人稀，多未開闢。漢末大亂，中原人士四散，孫吳建國江東，人才取給江淮間，則江淮之人必有避亂而南，作此後大遷徙的先聲者。及至西元四世紀間，五胡亂華，中州衣冠相率渡江，流入轉徙南下，洛陽一地，卽已十居六七，而青、徐諸州流入，乃多於渡江後，沿太湖

流域而徙入於今之浙江，是爲中華民族第一次的大遷徙。乃致永嘉以來三百年中，既已造成冠冕君子南方爲優的結果，更其形成文化日興，聲教廣被的社會成業。人口既庶，開闢漸廣，財富益增，地利遂著。所以晉元帝謂諸葛恢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其殷實可以想見。唐時「揚一益二」，揚州繁華居全國第一，而浙江其時初屬江南，財富重心所在，人口自盛。永嘉之後的八百年，而有靖康之亂，中原人士作第二次的大遷徙。此役竟使浙江一躍而「爲天下中」，經濟政治，並爲中國重心所在。南渡將相，多籍中原，而浙江沿海內地，漢人更到處開發定居。其時杭州爲天下最繁華的都市，居民有百餘萬衆，後至的中原士庶，當在不少。浙江自是乃成漢族最優美的生聚教養之區域。

又據楊鳳鳴測驗浙籍二一〇人的結果，與江蘇同其奇特，浙江比江蘇更甚，其血清內不含疑集素的竟達百分之五六·七，所以浙江居民的血似比任何他省居民爲純淨。大抵以其時浙江雖有百越子遺，但爲比較的乾淨土，加之自北方遷來的移入後，很少散出於浙江省外的，所以能保持其特異點。反之，在其他省分，尤其是中原地方，則以異族混淆的結果，最不純淨。今浙江已完全爲漢族根據區域之一。

墮民散居甯紹各屬，其原有二說：一說南宋初金兵南下，宋將焦光瓚率所部降金。及至金兵既

退，宋人深恥其降，於是貶其衆爲賤民。一說明初俘陳友諒的部族，編之爲丐戶。然此種區別，爲屬於政治的原因，而與漢族並無血統的不同。其民大抵男子充吹手，或習賤業，或收販舊貨，婦人均爲喜娘，男女皆世其業。所居之地，自成一區，外人賤之，不與往來，彼亦自成風氣，甘於卑賤。今紹興城內三埭坊一帶，有墮民住處，可資考察。清雍正時，墮民與浙之九姓漁戶，同除籍爲良，惟積重難返，至今尙沿舊俗。其人數據浙江民政廳十八年九月調查：共一八、三一八人，計東陽二、八七四人，義烏一、八七四人，溫嶺二、一一二人，上虞三、二九五八，餘姚三八三人，鄞縣一、一〇六八，慈谿二、二二〇八，奉化二、〇〇〇八，鎮海一、三一六八，定海六六五人，象山三八五人。九姓漁戶俗稱爲江山船，其人舊隸建德縣，胥陳友諒部族。及至陳友諒敗亡，明太祖俘其子姓九族，詔其人以船爲家，不許登岸。九姓爲陳、錢、林、李、袁、孫、葉、許、何。原有船隻數千，歲納漁課。船有菱白、頭亭兩種，以魚少稅重，其家屬則隨船習弦唱，以侑觴娛客，不能自拔，習以爲業。清及民國，曾數度明令改善其社會地位。今其中的婦女，已多捨舟登陸，集於蘭谿、杭州等地。據浙江民政廳十八年九月的調查：共二、八三九人，凡樂清七一九人，桐廬六四二人，開化一三八人，衢縣三四二人。至於外僑入住浙江的，史亦數載不一見，如葡萄牙人之留甬，阿拉伯人之居杭，但皆因政治關係，而終移去。

惟在近代期間，浙江由各省移入的居民，則誠屬頻繁，尤以洪楊一役爲最。緣清兵與洪楊兩方在浙江互相斫殺近十年的結果，居民逃亡無算，杭州一地，遭難人士約占百分之七十五，亂後江西人大批移入。浙西各地亦然，如餘杭、長興、安吉等地，皆客強主弱。客多來自湖南、江西、安徽等地。至沿海及浙南等地，則有福建人的移入於象山、定海、松陽、瑞安、樂清、龍泉、溫嶺等縣境內。又皖人亦多就商於杭州、衢縣、金華等地，經營農業於壽昌等縣，固皆有記載可循。

反之，浙人亦多外移，如寧波人的經商國內各埠，上海一地卽有四十萬衆，其他爲輪船水手，乃至如青田人的經商歐美日本者，亦不在少數，其中當有若干作定居之計的，故亦有一述的價值。

浙江開闢史的鳥瞰

從文字的記載中，對於浙江各地開闢的演變作一鳥瞰，可自政治、經濟、文化、風景等方面，各作一今昔輪廓的稱敘，便可得其梗概。

政治方面——卽自府縣的增設一端，已可很明顯的得見其間開闢先後之跡。浙江最早開闢之地爲會稽，卽今之紹興。越國初都其地，秦漢以前，始終爲百越的中心。楚威王敗越，略地不及浙江

之南。秦始皇時，王翦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所設縣治，多沿錢江兩岸。及西漢武帝時，移甌越、閩越之人於江淮間，始於沿海設回浦縣（今臨海境內）後漢繼之，增置永甯縣（今永嘉境內）及至三國吳時，討平山越，增置郡縣，新安江流域舊嚴州府屬六縣，吳建其五。五胡亂華，中原人士相率南渡，浙東多佳山水，遂以大開，名士尤多集於紹興一帶。沿海地方，在晉時亦增設縣治，其時今浙江境內除吳興、會稽二郡外，且置東陽、臨海二郡（今浙江境內其時尚有吳、新安、義興三郡屬地）可見此時浙中及沿海一帶已漸重要。南朝之時，永嘉、金華亦設郡治，仍沿兩晉開闢的趨勢。有唐統一中國，改設州治，在今浙江的爲湖、杭、睦、越、明、衢、處、婺、溫、台十州（嘉興、海鹽屬蘇州）明州爲唐時蕃舶寄泊之地，以是漸趨開闢，舊甬屬七縣的建置，唐占其四。五代時吳越保有兩浙，流徙盡集，休養生息者八十餘年，而秀州（今嘉興）始置，不再隸蘇，於是浙江舊十一府，大致粗具規模。南宋繼之，行在的繁華與內地的開發，大見進步，不啻爲浙屬各地，作一次升格的運動。元時建省設府，明代於舊嘉屬處屬各增設三縣，嘉屬則以沿海斥鹵之地，海潮時至，元固海塘，生聚遂盛。處屬則以磽确岩壑之區，開化宜其較後。清則開闢海島，定海、南田、玉環、孤懸海中，先後成立縣治（定海係恢復）。民國二十八年秋成立的一縣，斯爲東陽、永康、縉雲、仙居、天台間之磐安縣（縣治設大盤）。至今浙江共有市

二（杭州與溫州）縣七十六。綜論浙屬各縣設置的經過爲在江海之交者最先開闢，錢江以及沿海各縣，設立亦較早。其以戰亂關係，新安江流域各縣，早於三國時開闢，雖屬改土歸流，亦緣於水道關係，而沿海島嶼則以海上倭盜諸種原因，加以漢族不嫻海上經營，南田等三縣建置，遲在民國。嘉屬則以特殊原因，可視爲例外。處屬開闢最晚，乃在此次抗戰期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遷至其間，誠令人有處屬反成爲浙江中心之感。

經濟方面——周禮載揚州之地：「其利金錫、竹箭、畜宜鳥獸、穀宜稻。」大抵主稱江南，兼及浙西一隅之地。晉魏以前，浙江雖有農藝，但不著稱，而著稱於史者，乃爲絲織鹽鋼之利，是紡織化學與冶造工業，早盛於浙江。浙江在古時稱爲火耕水耨之鄉。三國吳時，土著山越早有農作的經營，男女辛勤操作，但係自給自足的公社制。及至南渡者日衆，侵攘開闢，由以頻繁。隋開運河，江南繁華，已與中原相競。及至唐代安史之亂，中原糜爛，江南財賦，乃爲支撐唐室統治的主要力量。是經濟的重心，已自中原而移於江南。五代吳越國以十五州之地，當天下之半，其富庶可知。而尤能大修海塘，盡開地利，國外貿易興盛，市舶之利倍蓰。繼爲南宋，同以一隅之地，內事豪華逸樂，外供封豕長蛇，言其富庶，尤足以動北人之歎羨，起異族之野心。明則「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布政司二

百七十五萬二千餘，當天下九分之一。」（續脩勝錄）清則尤見重要，經濟文教，兩兩並盛，魚絲之產，冠於各省，衣食被於中外，至今依然。魏頌唐列浙江全境爲三區，浙東爲山區，其範圍跨浙東西而有之，約五十餘縣，錯雜山陵地帶之中。沿海區包括沿海各縣之地，迤邐不下千有餘里（浙江島嶼數，在沿海各省中爲最多，共有一、八〇六，面積次於廣東，爲五、九六四、五四九、〇〇〇方公尺，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平原區則爲浙西杭嘉湖各縣，除近於天目莫干兩山脈之各縣爲山區外，餘悉屬之。論其經濟價值，以平原區爲第一，沿海區爲第二，山區爲第三，而各區在歷史上開闢的次第，正與之相應。泛論各區物產之饒，則如著名之紹酒、金腿、紹綢、台絹、新嶧絲繭、溫台稻米、柑橘之類，皆山區各縣的出品，而茶葉尤爲山區各縣的特產物。沿海區則漁、鹽生產，歲額總數在千數百萬以上。平原區範圍不過十餘縣，而絲、綢、茶、棉、綢布、織物之利，成績偉大，已爲全浙富庶的中心，駕山海二區而上之，以是開發亦稱最早。

文化方面——似與經濟相得益彰，或更如影隨形。古代越國文化，異於中原，秦漢以降，江淮移民入境既多，而中原文化亦駉駉乎達於東南沿海。濡染稍久，到了東漢的時候，浙江乃有若干人才的產生。孫吳建國，取材本土，已足以稱雄江東，卓然樹立，以與蜀魏鼎峙。而人文的開發及取中原而

代之的樞紐，則在於西晉永嘉之亂與北宋靖康之難。前者使兩浙文化與中原文化對立，後者竟致兩浙文化取中原文化而代之。又其中如唐前海塘的建築，錢鏐和平的確保，對於文化孟晉的影響皆爲重大。而論兩浙的文化，實又誠堪代表中國的文化：五胡亂華，士族南渡，王謝高第，萃於會稽。山水清幽，文章華美，乃有釋道的侵入，當時文學之士多與縉流羽客往來，影響文化，誠非淺鮮。宋室南遷，衣冠集於臨安，提倡對外互市的結果，大食商賈攜估物與回教文化以俱來，其接觸濡染，刺激使進步者良多。及至清世，海禁大開，浙江居江海之交，得風氣之先，易爲接受時代潮流，加以承平日久，生活豐裕，故學術人才，至清代而極盛，迄民國而猶然。

風景方面——開發之遲速，固係於地利的厚薄，人力的豐吝，但山水的佳麗與生活的安定，亦與一地方的上層文化之建樹有關。浙江得天獨厚，山水清幽，乃使國中聰明才智之士，生活富裕之輩，流連忘返其間，以開發自然之美，此與地利的興闢，同其重要。蓋此輩文學與富貴的人們，實有宣傳鼓舞的作用。跡其大端：東晉則發現四明天台，其中迄爲仙佛之國。孫綽天台賦所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繼之發現雁蕩，康樂賦詩紀勝，此對溫台開發，很有影響。而會稽山水，更爲晉時名流所樂遊居。謝安石高臥於東山，王羲之雅會於蘭亭，風流蘊藉，古今豔稱。而吳興則

東南沃壤，山水清遠，名流朝貴，至求朝廷放爲郡守，以快生平。他如北山、剡水、鑑湖、湘湖、武林山、東錢湖等，皆爲晉代前後名流宗師所寄寓鼓吹的勝地。山川詩句，相得益彰，若謝靈運之與永嘉，孫倬之與天台，吳均之與苕霅，白蘇林逋之與西湖，一經品題，更教湖山生色，逼人入勝，遊跡所至，文物繼起。唐人之與天台，宋人之與西湖，題詠特多，又足以覘知其開發與時代的風尚之所在。而若耶溪、嚴子陵、錢江湖，以及雁蕩、天目、爛柯諸山，亦爲今古騷人遊客所樂道而不衰者。張其昀師論云：「浙江風景區之開闢，多與寺院之建築有關，森林之保護，道路之修治，寄宿之便利，遊覽之嚮導，多仗僧侶之力。而非宗教性質之史蹟，雖在民族史極有關係，類多荒蕪寂寞，遊客遠不逮僧寺之盛。惟莫干山避暑區爲一特例。」實有其歷史上和事實上的根據。

本書的分章與其要點

本書共分十章，每章各有其重心之所在，但關於一般進步的地方，仍予以各章敘述，俾得前後貫通，庶符於史蹟賡續之義。而於文化、經濟，則每章不廢。至於浙江史的分期，本文並未予以明顯的劃定。陳訓慈師於浙江省史略一書中，列浙江的開發爲三期：一、自周季以至西晉約八百年，可說是

浙江開闢時代；二、自東晉迄於北宋之末，約八百年間，可說是浙江文化的蕃育時代；三、自南宋至清止七百餘年中，可說是浙江的興盛時代。作者頗爲同意，惟本書則未嘗予以討論。因本書所論範圍較廣，非僅以文化一方面爲限，且往往一事起訖，或分期討論，而一章之中，又往往作某事始末的敘述，用便省覽。故不予劃分，庶免膠瑟。

憶浙江自古卽以雪恥興國而著聞於世，故事流傳，令人可歌可泣，古代越風，尤堪仰止。三國吳以降，至於南宋，除隋唐一時期外，浙江皆屬偏安之局，始終爲中原人士避難之所，安樂之鄉。宋明亡國之痛，亦以浙江地方所感受的爲最深刻，故浙江在近代史上，乃成忠義之邦。這是由先烈灑熱血拋頭顱的結果。而元明期間的倭寇，尤使浙江劍痛深鉅，迄今遺跡猶存。但以釋教廣被文藝發達的結果，昔日良風美俗，時虞消失，而綺靡懦弱，往往轉勝他省。此作者所以在文中時予以指明或影射，讀者當能體察與記取此一微旨。

最後尤應特書的，日本以受唐時中國文化，而完成其文化改革，以受明代理學，而完成其明治維新。中國文化與理學，固爲全國今古人士心血的結晶，但浙地浙賢，實與日本有明顯的關係。唐代文化，俱自寧波輸出，當時日使皆在寧波登陸，以入中土。而日本所承受的明代理學，則爲王陽明、朱

舜水的學說和傳授。又若天台禪宗，實與日本武士精神的養成，有很大影響。今日人反恩爲仇，侵略我國，深陷泥淖，頓兵錢塘，終致請降遣去。我們一讀浙史，真有無限感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浙江與中我們誠可以記取至可寶貴的教訓，以爲安不忘危與省建國之鑑。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論文：

衛聚賢

吳越稱名（江蘇研究）

史國博

李化民 浙江景寧柘木山畚民調查記

張君俊

中華民族之血統（東方雜誌三卷一五期）

魏頌唐

浙江經濟紀略

張其昀

浙江省之風光（科學二卷）

陳訓慈

浙江省史略（浙江青年月刊）

張其昀

浙江史地紀要（商務本）

林薰祥

中國民族史（商務本）

浙江通志

第二章 春秋越國前後之浙江

石器遺物的發見

浙江在三代之世，列爲蠻地，不齒於中原各國。然在傳說方面，則要溯源於夏后少康，至於文獻記載，始自允常。惟春秋中關於越國的記載，不啻總量百分之一，國語中有越語，雖與吳獨立成篇，然所佔篇幅亦不過百分之五強，記載雖較春秋爲詳，實多闕疑。稍後有史記越世家及越絕書，（西漢末袁康爲補充中原記載而作，）與時俱進，視前稍備。但關於春秋以前的越國仍少詳確的記載。史料既簡，古物無多，被視爲蠻荒之地，今古一揆。

幸近年以來，江浙一帶，以發掘古物的結果，在杭州、紹興、餘杭、湖州等處，曾發現了很多古代沒有銅鐵以前人類使用石作工具的石器，和乍浦、澉浦及紹興等地發現與石器時代同期的陶器，這些陶器之上，均有用布印成的幾何形花紋，此種發現，足以證明浙江在五六千年以前，已有很高的

文化。綜先後已經發掘者：(一)新石器時代末期遺址 1. 嘉興雙橋及胥山，2. 海鹽尚胥廟，3. 吳興東
鮑塘及岷山漾，4. 杭縣古蕩，5. 杭縣第三區一帶；(二)黑陶文化遺址，杭縣北鄉；(三)印紋陶器遺址，
1. 蕭山越王城，2. 杭縣古蕩後第二區一帶，3. 海鹽乍浦，4. 嘉興東門及胥山，5. 吳山岷山漾，6. 紹興
(四)玉器遺址，1. 杭縣安溪，2. 嘉興雙橋。上述黑陶文化，在中國初度發見於山東城子崖地方，考古
家僉認為遠古東方的固有文化，實為構成中國最早歷史期文化的重要分子，為期約在殷商以前，
而胚胎於中國東部沿海一帶，由東西漸，所以在安陽殷墟，亦往往有所發現。茲在浙江發見，當係自
北而南，足以顯示華夏民族曼衍的蹤跡。於是三代以來春秋以前浙史的缺頁，乃得有敘述之資，更
可以彌補前此春秋逮漢期間記載簡略的缺憾。

傳說中會稽的夏禹事跡

關於浙江最古而未由證實的記載，則為夏禹的事跡。越絕書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上茅
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吳越春秋和水經注，皆有相似的記載。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
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丘聞：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其大矣。」因最後一則流行的關係，後人言會稽，皆以浙江紹興一地當之，實難徵信。更踵事增華，而有禹陵，（在紹興城南十五里香爐峯北麓，明鄭善夫定禹陵在禹廟南數十步，因立石刻「大禹陵」三字，覆之以亭。）禹穴，（鄭善夫禹穴記：「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於塗山，尋崩，遂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的產生。關於古代會稽一地的何在，近來學者殊多勘辯，或言在晉，或言在魯。不過越與夏禹有相當的關係，則亦為近人所首肯，大抵夏禹後人有移至浙江者，作為後世中原人士南渡的先導，實為一可能的事情。

春秋時代越的由來與興亡

越王勾踐的由來，見於國語越語和史記越世家，後者云：「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大抵其執政者或為中原漢族，而其民衆，則為

九夷之從吳越者，史乃以上立下，以偏概全，稱爲禹之苗裔。至戰國初期，勾踐疆界南至於勾吳（今諸暨），北至於禦兒（今崇德東南），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今衢縣）。沼吳之後，則自今江蘇之淮南起，而奄有江蘇和安徽的南部，江西東境的一部，更後福建北部，亦爲所開拓。滅吳後，並曾北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今山東滕縣地），一時東方諸侯，皆趨賀之，稱勾踐爲霸主（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勾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是勾踐爲東夷的霸主。）但自勾踐以後，即缺歷世紀年。越絕書云：「……親失衆，楚伐之南山。親以上至勾踐凡八君，都瑯琊（按瑯琊今人多主去會稽不遠，而非在今山東境內），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越之亡，據史記所書，當在周顯王三十六年（西元前三三三年）史記越世家云：「楚威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按越絕書和史記所記世系不同。）直至秦漢之際，方纔又復興了甌越和閩越兩國。

臥薪嘗膽的復國故事

太湖之濱，吳越接壤，綜春秋之世二百四十二年中，吳越間用兵者十次，周敬王時，吳王闔廬既

敗楚國，又乘越王允常新歿，興師伐越，越王勾踐（允常子）以敢死士擾吳陣，乘間敗吳師於檣李（時爲周敬王二十四年，西元前四九六年，檣李故址在新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吳越戰場，相傳在縣西南二十里，今名爲草蕩的地方）。闔廡受創死，垂逝，囑其子夫差必報越仇。夫差積糧極準備，未敢一日或忘，使人立於門前，當其出入警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父之仇乎？」對曰：「唯，不敢忘。」同時勾踐不從范蠡之諫，輕舉發兵，爲夫差大敗於夫椒（在今吳縣西南），勾踐領五千餘殘兵退保會稽，吳王追圍之，勾踐依范蠡之勸，卑辭屈節的向吳請和，當時吳臣伍子胥勸夫差勿允，而越臣文種獻計賂吳太宰嚭，以美女西施（傳爲今諸暨亭羅村人）寶器爲請成條件，吳王竟聽嚭言，而不納伍子胥諫，終於罷兵。國語吳語和越語及吳越春秋中，並載有「越以金玉賂君之辱」和「越王請管吳王蠶便」的話，戰敗條件，誠爲苛酷，越王先後臣吳三年，方獲釋歸，自是節儉勤勞，臥薪嘗膽，用范蠡主軍，文種主政，「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以國小民寡，於是獎勵蕃殖，因之人口日增，兵士由五千人增至五萬人。三軍之外，更爲左右勾卒，並練水師，此屬軍事上的改良。同時獎民耕績，準備三年的被服糧秣，以爲雪恥與國之資，所以當時民歌曰：「嘗膽不苦甘如飴，女工織葛不收遲。」又歌出軍曰：「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如斯「明恥教

戰一者七年。

同時在太湖另一面的吳國，因累勝之餘，而驕逸放僻，荒淫無道，殺伍子胥，傾全國之師遠離國土，北會諸侯於黃池（今河南封邱南），范蠡乃乘吳兵遠出內部空虛的時候，勸勾踐發兵四萬人伐吳，大破吳國。吳越春秋記載此戰的經過云：「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姑蘇。熊夷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焚姑胥臺，徙其大舟。」當時水陸並進，要吳王歸路，以大迂迴的戰略，直搗吳的中心。夫差南來請和，當時越因時機未至，許其暫和。其後四年越日強而吳日弱，勾踐再發兵破吳，圍之三年，棲夫差於姑蘇，吳王再請和，范蠡不許，夫差乃自殺，越遂沼吳而併有其地，時爲周元王三年（西元前四七三年）。平吳之後，越代吳而稱霸，以兵會諸侯於徐州，故後之治史者，有將吳越入於五霸之列，是越之地位，在當時中國，勾踐曾予以相當的提高。越更貢周，受命爲伯。

惟越王勾踐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與國時諸勳臣，先後相繼譏死，去，勾踐四傳至於無疆，陵師弱楚，竟出兵伐楚，人數無多，一戰而敗，楚威王遂殺無疆，盡取從前吳國的故地，其後三世至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越乃覆國，自後爲楚地者百有餘年。

古代越風的一斑

古代中國文化，以黃河下游爲中心，越在東南邊鄙之地（當時「胡越」一辭以喻相去的篤遠。）言語不同，文化遠較中原諸國爲落後。惟在許多方面，自具其特異之點，如斷髮文身，契臂取信，嗜食海貨等事。但因濱海低地，嫻於舟楫，習於水門，所以淮南子齊俗訓云：「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蓋已成爲當時普通社會共同認識的事實。而越地銅器製造，尤遠邁於中國其他各處，中國銅礦，所在皆是，古代採銅中心，漢前爲越蜀兩地，越之寶劍，尤爲今古盛譽所歸，當時有名的冶工，在吳爲干將，在越爲歐冶子，歐冶子爲越鑄劍五：一曰湛盧，二曰純鉤，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流傳吳越，著聞於世（按今武康莫干山，龍泉南門外，皆有歐冶子鑄劍遺跡的傳說。）其習尙今日可考者：一爲銳兵任死；越絕書云：「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楫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世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韓非子，尸子又有勾踐式怒蛙的故事，蓋與勾踐范蠡之教戰，尤有關係，其時好勇之名，與良劍之譽，並稱於秦漢，漢書地理志云：「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發。」今日文弱之風，乃是秦漢以後中原移民，與濡染儒釋的結果。一爲愚戇輕薄，漢書嚴助傳載淮

南，王安石武帝書云：「……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可用天下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淮南子務修訓云：「越人有重遲者，其人謂之鈔。」至於西子病心，隣人效顰的故事，尤可以見其嬝嬝遲重的一斑。一爲好鬼成俗，此是當時江南之風，荆楚已然，越至秦漢此風迄未衰歇，列子淮南子皆載有「越人磯」的話，後世且變本加厲，誠可謂爲淵源自古了。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論文

施昕更 浙江遠古的歷史 浙江青年

陳訓慈 浙江省史略

羅香林 古代越國考

史記

吳越春秋

國語

淮南子

浙江通志

第三章 秦漢的設治和三國吳之開拓

秦在浙江所設的郡縣

西周以降，吳越通於中國，如太伯適勾吳，斷髮文身，從宜從俗，以漢族之人，適異族之土，季札遊聘中原，和吳越先後北向稱霸。接觸頻繁了之後，吳越文化方始稍稍可觀，然除太湖流域（浙江在昔合於吳會，與形成不久的今日之區劃不同）外，會稽以南皆爲地廣人稀，草萊未闢之區。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蒙武定楚，以其地置楚郡，迨統一天下，二十六年從廷尉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今浙江設會稽郡（卽於前稱之楚郡，分置九江、鄣、會稽三郡）。史記始皇本紀：「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又與浙江有關者，兩郡，一爲鄣郡，一爲閩中郡，史記東夷列傳：「秦併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以其地爲閩中郡。」至於縣數，楊守敬推測其時全國縣數當在八九百，會稽郡領縣二十四，在今浙江者十七，爲錢塘（故城在今錢塘縣西靈隱山下）、富春（今

富陽、餘杭（故城在今餘杭縣治苕溪南）、山陰（今紹興）、諸暨、餘槩（今蕭山）、剡（今嵊縣）、餘姚、上虞、大末（今龍游）、勾章（在今慈谿縣地）、鄞（在今鄞縣東）、鄞（今奉化）、烏程（今吳興）、由拳（故城在今嘉興縣南）、海鹽（故城在今平湖縣東南）、烏傷（今義烏）、郟郡兼有今浙江西北長興、安吉、孝豐諸縣地，但僅設故郟（在今安吉縣西北十五里）一縣，閩中郡兼有今浙江溫台一帶地方，不設縣。始皇又曾臨幸過浙江。史記秦始皇本記：「始皇二十六年，兼併天下，二十八年始巡郡縣。」先後於巡幸三次，刻石七起，「三十七年，出游，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按當在今富陽境地），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是爲會稽石刻。」會稽山在今紹興東南十三里，唐張守節於所著「史記正義」中云：「其碑見在會稽山，其文及書皆季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鑿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則唐時刻石猶存，其後集古、金石二錄，皆已不載，則宋時想已佚亡，始皇之至浙江，大抵爲巡狩四方，表彰秦德，和嚮望於禹之故跡的緣故。

兩漢治下的浙江

秦失天下，楚漢相爭，項羽率江東子弟八千人，逐鹿中原，其中當有居今浙江境內的健兒，然羽終以計誑和不能知人善任而失敗。漢高祖六年（西元前二〇一年），灌嬰定會稽郡，其先一年，封無諸爲閩越王，繼又封搖於東海（卽東甌），當今溫州永嘉。嗣高祖大封子弟於天下，浙江初隸荆後改吳，先後封劉賈與劉濞爲王。自漢初逮於後漢之末，其間大事，可以列爲下面三端：（一）分郡增縣——武帝元封二年，鄣郡更名丹陽，其後三年，於全國置十三部，各設刺史，會稽丹陽，其時皆屬揚州刺史部。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及至後漢，揚州部統丹陽、會稽、吳等六郡，其在今浙江省的屬縣，爲吳郡之烏程、海鹽、餘杭、由拳、富春五縣，會稽郡之山陰、鄞、烏傷、諸暨、餘暨（蕭山卽前稱之餘暨）大末、上虞、鄞、餘姚、句章、鄞、章安（今臨海境內）、永寧（今永嘉境內）十三縣，丹陽之故鄣，於潛二縣。後漢末年，增置永安（今武康）、安吉、長山（今金華）、新安（今衢縣）、定陽（今常山），連前共二十五縣，爲今三分之一。（二）徙東甌之民於江淮間——武帝時，因閩越襲擊甌越，乃先後兩度徙閩越甌越之民於江淮間，這在漢族內部的挖搏工作上，頗屬重要。而當時浙江東南地方，遂成空虛情況，爲此後南渡的中原人士預備好一尾閭的地方。另一方面百越人民能移於江淮間，必其民雅馴和漢化已有相當程度，北徙之後，當很快的融合於漢族的中原大熔爐中。嗣後南渡，又必有其

人再行復反故土，實是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三)人才之漸露頭角——兩漢以來浙江人才之見用於中央政府，雖不重要，但已見端倪。惟一開始即表現一特色，即儒林宗教中人的蔚起，由於環境的原因爲多。又兩漢時的浙江人才，多出於嘉興、會稽兩地，可爲列舉的有名人物，如朱買臣、鄭吉（屬武功）、王充、嚴忌、嚴助（屬儒林）、張道陵、魏伯陽、劉（晨）阮（肇）（屬釋道）皆是。

秦漢期間浙江的經濟和人口

揚州在上古時代，開闢甚遲，所以在禹貢上位次甚低：「厥土塗泥，田下，賦下上錯。」周禮則稱：「其利金、錫、竹、箭，畜宜鳥獸，穀宜稻。」秦漢之際，中國農業經濟的中心，在黃河中下流一帶，江南名產，祇爲枏、梓、竹、箭，可見地利尙未開發。「火耕水耨」未及的地方，當然有枏、梓、竹、箭的自然林。通典云：「後漢順帝時，馬臻爲會稽太守，始於繞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千餘畝。」水利漸修，史又稱嗣後郡無凶歲。史記貨殖傳云：「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墮蠃蛤，不待買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昔竊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農業稍見發達，所稱地勢民情，至今未變。西漢文景之世，初不禁國人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濞

擅利海澤，既以製鹽致富，更招天下亡命，開今安吉銅山以鑄錢，當時吳、鄧（郢通）錢布天下，山東奸猾成聚，吳國桓寬鹽鐵論云：「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高而逆節之必作。」因之，乃有削地之役，言乎人口，武帝曾兩徙百越之民於江淮間，但反之因為中原人多邊徼屯田之故，當時亦曾徙關東貧人於會稽，通典云：「景帝二年，詔郡國，令人得去澆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兩漢人口，大抵集中山東、河南、河北、陝西之間，惟後漢比較前漢時，長江流域的人口，顯見增加。浙江戶數人口，兩漢之世，約佔揚州部屬三分之一，而揚州縣數戶口，在前漢時約占全國十五分之一，迨及後漢，則已進至約占全國十分之一了。其增加原因，不外自然趨勢和避亂等等，同時漢代運輸工具海船已利用至於相當的程度，從會稽到交州各郡即為利用海道，經過臨海（台州）、東冶（福州）到番禺和龍偏（河內），東漢之末，天下大亂，浙江其時外有海賊之擾，內有山越之亂，熹平元年，會稽許昭起兵勾章，稱大將軍，攻破城邑，乘以萬數，臧旻連討三年，方告救平。

三國吳的開拓事業

東漢季世，統一之局破壞，混亂中的結果，是三國鼎峙，歷時甚久，蓋以吳蜀常聯合抗魏，以牽制而收均衡之效。吳國孫氏，爲今浙江富陽人，奄有江東，與蜀魏並立，其影響浙江者頗大，彌有承先啓後的功績。考三國前的浙江，浙西自來包括於吳，地勢平衍，水道縱橫，已及早開化，但浙東則除山陰一地外，餘皆百越之所聚居，溫台沿海地方，漢代雖徙其民江淮間，繼設章安、永寧等縣，但仍以甌脫視之，及至孫氏，偏安一隅，政權獨立，對此股肱桑梓之地，不容漠視，從而開發後方，以爲尾閭，實乃一種必然的趨勢，加以東漢末年，中原大亂，漢族相率南渡，青、徐、泗一帶的北方人士，便渡江越太湖流域而南徙於浙閩等地，與土著豪族相爲結合，以維偏安之局者五十餘年。綜吳國一朝，關係浙江的大事：

(一) 討平山越——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有云：「山越者，自周秦以來，百蠻總稱，百越伏居深山，故名山越。」粵越相通，古有百越之目，越以百稱，喻其種系之多，以居地而異其稱號。山越至三國時，方始著稱，據居吳國諸郡的山地，屢起叛變，爲吳的心腹大患。考三國之間，雖不時相攻戰，但皆能安攘外禍，如魏之征烏桓，蜀之定南蠻，吳之平山越，其途雖殊，其揆則一，爲漢族的勳績。其時吳國境內山越所居之地，有會稽、新都、丹陽、豫章、吳興、鄱陽、東陽、吳、廬陵九郡，在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地，

卽西漢時甌越、閩越、南越的舊地。此種古越族的遺民，習性桀驁果勁，勇敢好戰，依阻險地，負嵎不服，因之乘間寇盜，並受曹魏誘惑爲內應（按吳亦結納遼東公孫氏爲曹魏患），附豪族爲變亂，吳爲安內計，不得不臣魏和蜀，用宿將爲令長，任諸葛恪專討伐（東漢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拜諸葛恪爲撫越將軍），厲行漢化，廣設郡縣，絕其糧秣，致其降服。凡「禍延六十餘郡縣，賊之稱帥者十二人，以名稱者二十三人，不名之統兵十數人。」（劉芝祥山越考）吳一代先後征伐山越，大小計四十二役，其在浙境以屯聚會稽爲最盛，據地最廣者爲嚴州的西境，所以嚴州府屬六縣，建於孫吳一朝者，至五縣之多（爲建德、始新、桐廬、新定、新昌五縣）。後乃役屬山越之民爲兵（吾想明代戚繼光所募之義烏兵，其間人民必特多山越人的血統無疑），號稱精良，黃蓋至謂：「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見報曹操書）而山越之民又能事稼穡，闢道途，遂爲漢族所吸收的優越血統之一。

（二）增設郡縣——浙江各地開闢，以三國吳數十年間，在上古爲最盛。吳揚州十四郡，在今日浙江境的，爲吳興（吳新置，爲今浙江境地之屬於吳郡丹陽者，轄烏程、陽羨、永安、餘杭、臨水——今臨安、故鄣、安吉、原鄉、於潛等縣，自是盡改屬吳興，治烏程，丹陽則別爲一郡，不復與浙相繫），會稽

(鄞、鄞、勾章、山陰、永興——今蕭山、諸暨、餘姚、上虞、鄞九縣屬之)東陽(吳分、會稽新置之)長山、大末、烏傷、永康、信安、吳寧、豐安、定陽——今常山、遂昌屬之)臨海(吳新置之)章安、臨海、始平——今天台、永嘉、安陽——今瑞安、松陽六縣)四郡又吳郡之嘉興、海鹽、鹽官(今海寧)錢塘、富陽、桐廬、建德、壽昌八縣、新都郡之始新(今臨安)新定(今遂安)二縣、占六郡之地、有縣四十三、會稽以東以南、分郡添縣、漸次開闢、前此會稽郡遙轄今福建北部一帶地、自吳置建安郡、於是浙西既不屬於吳(新置之吳興郡)而閩北亦不屬於浙、今日浙江分省輪廓、大致粗具。

(三)海上交通——孫吳曾北結遼東、高麗以爲牽制曹魏之計、並於東南沿海、訪求新地、吳志云：「黃龍二年、遣將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當爲琉球)數千人還。」亶州大抵指今日本(一說爲臺灣)吳時會稽人有爲接引外商者、因爲所住地方與外國接觸既多、爲時又久、自有這種人才出現、史載黃初五年(西元二二四年)會稽劉咸送大秦商人秦論(一作倫)中道病歿、論逕返國的事情、吳居東南臨海、自易與西方各地、有海道上的貿易、同時以海船應用、自會稽至龍偏交通相當利便、故曾遣使康泰、朱應通扶南數十國、聲教南

鍾，遠邁已前各朝。

(四)經濟人才——吳時浙江地利日闢，農業漸興，疆土既廣，人口自增。而以海上交通，熱帶珍異物產，緣以萃聚，本土所產竹木鹽茶之利，不可勝用，周瑜所稱：「六郡之衆，兵精糧多……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而人文更見發達，佐命之臣，多係本土俊彥，而中原流入相繼避地江南，以是「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顏子推語)流風所屆，學術自日昌明。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論文：

容庚 秦始皇刻石考 燕京學報第十七期

劉芝祥 山越考 史地學報

林惠祥 中國民族史上冊

史記

通典

三國志

浙江通志

第四章 晉室南渡後的浙江人文

中原文化的深入浙江

漢族文化發祥於黃河流域，繼而導化東夷、西戎，和攢除北狄，惟開拓「南荒」則比較落後。春秋時的吳越，始以長江以南浙水以西的部分，和中原隸通，不過論及普遍的開發和中原文化的廣被，則自兩漢方纔伊始，三國吳之建國江東，實爲此後晉宋渡江，南方開化的先聲，討平山越，增設郡縣，在短短的時期中，作政治文化諸方面的一次積極性的飛躍。及至東晉以降，江南——尤其浙東，中華民族方始爲之作一全面的展開，而肆力於移民教化的墾植。溯當五胡亂華以前，中原漢族爲自中原的西北兩部，向中原的東南部移轉，迨至五胡亂華以後，當時國內在經濟方面固已及早爲南方廣闊之肥沃的耕地所吸引。在政治方面，更以中原的擾攘，而被迫於南遷江左，其時中國自北嚮南，形成波浪的橫流，滔滔直瀉，北方五胡民族，移入黃河流域，而久住於黃河流域的漢族，則大部

移入於長江流域以南地方，後者的波浪，尤爲壯闊，演成中古時期民族的大遷徙。此其在歷史上的影響，爲北方復趨於荒涼，而在南方的政治上、社會上則以北方甲姓的南遷之結果，僑姓大族的勢力，一時壓倒了吳中大姓而形成僑姓大族的政權。南遷人數，曾無記載，大抵由僑置的州郡，可以推知其一二，惟是渡江不是一時的現象，而爲續續不已持久之人口動態，更以僑置州郡而招徠北方人口，觀其結果可闕一斑。宋書州郡志載：當時人口最多之州爲揚州、南徐州、荊州三州，揚州有一百四十五萬口，幾佔全數三分之一，南徐州四十二萬口，荊州約有三十餘萬口，所以南朝君主，能以揚、南徐二州作根據，維持建業的政府，當時以揚州爲王畿之地，領江東浙江，而當時移民則取道淮北及淮南向吳郡等今江蘇、浙江兩省移入，此輩流入仕族，一時將江南變作漢族文化的世界，其後百年之中（永嘉之亂爲晉懷帝時，當西元三〇七—三一〇年間，後東晉元帝於建武元年卽位，爲西元三一七年，恭帝在位，劉裕廢之，爲西元四一九年），以胡族內亂與晉室的輔弼得人，雖偏安江左，猶能志切恢復，屢興北伐之師，內而土地日闢，文教日盛。繼東晉之後者爲南朝的宋、齊、梁、陳四朝，與北朝的魏、齊、周形成對峙的局面，中經百七十三年，南方拓殖，繼續進行，其間佛教文化，尤爲廣被。抑地土旣日開發，士著寢以同化，昔日視爲荒徼的浙江，今日乃成爲政治文化的重心所在之地。

東晉時代浙江的盛況

西晉爲期短促，浙江郡縣大抵仍承孫吳舊制，西晉揚州統舟陽、宣城、淮南、廬江、毘陵、景郡、吳興、會稽、東陽、新安（新都改）、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南康十八郡，而在今之浙江者，吳興（統烏程等十縣）、會稽（統山陰等十縣）、東陽（統長山等九縣）、臨海（統章安等八縣）、四郡，又吳郡之嘉興、海鹽、鹽官、錢塘、富陽、桐廬、建德、壽昌八縣，新安郡之始興、遂安二縣。東晉揚州統舟陽等十二郡，而以會稽郡爲王國，其在今浙江者，除會稽王國外，爲吳興、東陽、臨海、永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又吳郡之嘉興等八縣，新安郡之始新等二縣，義興郡（永嘉四年置）之義鄉（今長興北境）一縣，新設之郡爲永嘉，增置之縣爲樂安（今仙居）、寧海、樂成（今樂清）、始陽（尋改橫陽今平陽）、長城（今長興）等（其後自宋經齊、梁、陳四朝，疆域如故，祇稍有變革）。晉時揚州既爲王畿所在，浙江更爲股肱奧壤，中原人士，一再南渡，所以浙江人口漸蕃，加以山川信美，甲姓仕族，多喜移居，紹興、吳興尤爲一時名流薈萃之地。晉室南渡之初，三吳豪族，曾請都會稽，其後名公巨卿，流連忘返，穆帝永和九年（西元三五三年）的蘭亭修禊，迄今膾炙人口，山陰道上，應接

不暇可以想像當時冠履的盛況。東山（在今上虞境內）爲謝安高臥之地，訪戴於剡中（今嵊縣）山水之間，故事流傳所在多有。吳興爲江左清樂之國，六朝名賢，至從人主上章請郡，風流政績，照耀湖山，此種風氣，網蘊中於浙江，迄今不衰。流離尾瑣之後，玄風依然，山水優游，簡放加厲，文學才華和山色湖光，相爲掩映，造成一種綺麗、悱惻、苟且、享樂的風尚。大抵南渡之初，僑置郡縣，不忘故土，人懷依復，及至爲時既久，與境俱化，山水移情，樂此忘蜀，斯種歷史陳跡，今日讀之，倍感沈痛。

抑以鋒鏑餘生，民間愁苦，慈悲之教，應運發揚，在氣味上更早具了基調，自正始以降，玄風暢流，般若空宗，適來東土，譯事既盛，傳播益廣，於是「天竺妙理」與「震旦流風」冥合一體，披靡全國。而在政治環境上，更有其千載一時的良會。晉失其政，內亂迭作，戎馬縱橫，五胡擾攘，中原板蕩，民生憔悴，荏弱之民，多飯服而祈福，高明之士，則避世以窮理。（劉國鈞西晉佛典錄中語句）於是「焚燹乎魏晉，煌煌乎宋齊，烜赫熾炎乎梁陳周隋之間，王公卿士，上焉倡導，豪賈大姓，下焉服務，父提子手，不釋不歸，兄詔弟耳，不佛不師，貨貝玉帛，懽樂棄施，髮膚肢體，無所愛吝，州供里養，家擎戶蹠。」（語見宋趙卞湖鎮舍利寺塔記）誠能狀其風靡草偃的情狀。故論佛教在中國發生鉅大影響的時期，不得不推六朝，而其中心，又不得不推今江蘇南部和浙江的所謂當日畿輔之地。六朝開其端，吳越

繼其緒，南宋造其極，先後縣縣不絕的倡導，釋教乃在浙江植有不拔的基礎與廣泛的傳播。迄今浙江猶爲中國釋教最盛之區，莊嚴的闡若，瑰瑋的雕刻，幾於到處可見。其時信教的人數，殊難推測，但觀於大德慧根的宗師們如慧明、支遁、惠約等的更僕難數，可見其盛。會稽剡縣之間，自帛道猷以來，其後支道林之徒，相繼來居。有十八僧之多，而開闢勝境，一時大盛，如慧理之建靈隱，曇超之興玉泉，僧護之造石佛，廣興、義興之建阿育天童，而竺曇、定光之居天台，更爲以後智顛的先導。且晉宋之世，隱逸之士居多，一班名流，更挖揚宗風，宏宣佛法，俱以學問精妙爲歸。君王以次如戴逵、王導、謝安、王羲之、孫綽，皆崇信佛教，爲時倡率。加之，浙西固風景清遠，「踰浙江以東，多名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巖峻，爲天下奇觀。」（方孝孺《中山草堂記中語》）僧舍佛剎，旣選優建置，一班名人文士，更盡情的到處探勝，如王羲之、謝靈運、劉孝峻、孔稚珪、沈約、吳均皆爲之流連忘返，題詠殆遍，詩賦記遊的作品，迄今尤膾炙人口。所以此時浙江一隅，誠是佛教的樂園，和遊仙的世界。

佛法莊嚴生活綺靡下的陰影

(一) 宗教方面——在上述的情況之下，爲時稍久，其必然的結果，乃爲趨向奢靡，漸失本真，但重形式，苟且享受，佛門的精華是被遺棄了，中原的失土是被渾忘了，於是「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吏空於官府，兵挫於行間，風俗頹敗，姦究弗勝。」（劉汝霖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自序）同時道教並起，葛洪（曾至餘杭山）、顧歡（鹽官人）爲之倡。比時釋道之間，尙少糾紛，但有藉米教聚徒陰謀政治活動的，因以造成大亂，如孫恩之自海上攻陷會稽，其時東土諸郡，疾首於會稽世子的縱暴，也多殺長吏以圖響應，旬日之間，衆至數十萬，孫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但不久爲名將劉牢之等所敗，然彼又逃海外，頻年內犯，直至其死，方告結束，長期征亂，東土爲之不寧。

(二) 政治方面——六朝以前，江南迄少爲中原的亂事所波及，所以是一片完好的土地，待闢的奧區，孫吳藉大族的擁戴，得以鞭笞百越，稱制南州，其後南方大姓，爲虞、陸、顧、魏，但及晉平孫吳，以至偏安江左，江南大族，聲光漸滅，洛陽仕族，什七南來，輔佐王業，矯然自表，對於久居江南的吳越之人，頗存輕視，兼以思復故土，羣以中原舊望相爲號召，於是政教仍握於此輩人的手中，遂成僑姓，而與地主的吳姓，形成對立的局勢，吳姓當然不甘居於僑姓政權之下，周玘（陽羨人仕於吳興）的謀叛，丘靈鞠（烏程人）的憤語，可知一斑。考其造成的原因，爲由於北人輕視南土，而政權握於北

人之手的緣故。通計宋、齊、梁、陳四代官員，士著大族，實佔少數，約成二與一之比（譚其驥氏統計南史列傳中的人物，凡七二八人——后妃宗室孝義等列傳不列——籍隸北方的有五〇六人，籍隸南方的僅得二二二人，見燕京學報第十五期晉永嘉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積不相下，遂致齟齬，侯景亂後，陳隋之際，江南的土豪大姓，方才復行崛起，乘勢爲雄。又如一班「名流」，深染玄風，放蕩形骸，遊山玩水，閨閣爲擾，謝靈運每次出遊，必攜百餘人與俱，社會爲之騷亂，時人驚爲「山賊」，雖傳後世，無益當時。

（三）經濟方面——東晉時代的江南，依然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其中，土肥稻美，其利甚溥，惟隋書尙稱其時土地卑濕，無有畜積之資，而揚越蠻夷，多未反復。但同書地理志載其間「川沃澤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這容爲異地或稍遲的情狀。至於南遷流人，仍作人隸，南遷仕族，則役屬土著，而政府待遇渡江的士族，又有分別，對早渡的優越，對晚渡的儉荒，此屬早渡者把握政權的結果。江南在此前嵐山封水，保爲家利，以一種自由農的身份，經營公田，及到此時，社會發生劇變，權門兼併，強弱相凌，自由小農，不得不依於地主而成爲農奴，加之政術但以應付徵斂爲事的結果，更助長一種封建形式「封屯」的形成。而在「各地方，有不少地方性的雜務，使土地與租

稅制度上表演着地方分割的姿勢。」（語見陶希聖南北朝經濟史島瞰）官吏地主以至僧侶，居社會之上層，侵漁北方南渡的流人和久住的自由農以及土著的蠻夷，頗似法國大革命前的情狀。國用除軍事之外，則爲供佛，又無稅則，軍國所需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行之不法，往往變成苛雜，以是生之者寡，食之者衆，致不時引起農民土著的叛亂，而與南朝相爲終始。

文人蔚起和天台宗

自孫吳以降，南朝立國既久，人文漸盛，文學藝術之士，此時已所在多有，王充虞翻開其先路，賀瑒、干室、吳均、邱靈運、王獻之、曹不興、孔稚珪等連鑠繼起，文史斐然，書畫佳妙。陳隋間智者大師（智顛）在天台山創天台宗，此於中國佛教史上開一新的紀元，確立中國的佛教。天台宗教旨，如止觀義例中所云：「一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爲指南，以大經（涅槃經）爲扶疏，以大品（大品般若經）爲觀法，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智顛更爲一大學者，又得陳隋諸帝（隋煬帝且受戒）的提倡，其門人灌頂日記萬言，煩瑣學風，披靡全國，其後唐代的文人學者，更或深或淺的受其影響，天台宗到那時更如日方中。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論文

張其昀 浙遊紀勝 地理學報創刊號

劉國鈞 西晉佛典錄 金陵學報

劉汝霖 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

譚其駁 晉永嘉亂後之民族遷徙 燕京學報第十五期

陶希聖 南北朝經濟史

浙江通志

隋書地理志

晉室南渡後的浙江人文

第五章 唐代浙江的國際往來

隋唐的統一與浙江建置

中國自東晉後，五胡亂華，內亂頻仍，三百年中，擾攘未已。隋楊堅篡周自立，於無形之中光復了故土，繼平吳於開皇九年（西元五八九年），統一了中國。開三十七年，天下又亂，李唐繼起，乃成漢族勢力遠振的一個偉大而光榮的時代。隋唐時對於浙江的建置，頗多更張，隋分吳地爲杭州、睦州，後置十三州，浙江爲揚州會稽（統縣四），餘杭（統縣六），遂安（統縣三），東陽（統縣四），永嘉（統縣四）及吳郡（統今浙縣二烏程長城）宣城（統今浙縣一）綏安郡地，唐又分婺州（舊東陽郡）之信安爲衢州，析越州（舊會稽郡）之句章爲鄞州（後改明州），以永嘉爲温州，縉雲爲括州（後改處州），加以湖州（舊吳興郡）台州（舊臨海郡），總爲十州，皆隸於江南道。（按其時江南道地域最遠，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江南東道轄今江蘇江南及浙閩全境，

設治蘇州、領州十八，浙江十州在內。）至德中，方鎮勢盛，浙江東西分置節度，浙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杭、湖十州，浙東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八州，嗣後時或改稱府、路，但區劃範圍，並無多少變更。復次「浙江」「兩浙」之名，自是以降，沿用於今。

隋唐期間浙江的經濟一斑

三國至隋唐統一以前，是一個國內亂離轉徙，農村經濟破產的時代，浙江僅有山越作亂反抗南渡的北人與土豪的漢人政權，以及偶一發生的南北豪族間的傾軋，不過浙江當時終當視爲比較地廣人稀開闢伊始的地方，所以大致說來，終較中原爲小康。平陳之役，有十年之喪亂，所以開皇九年的皇帝詔令有云：「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爲挽救江南的頹放既久的風習和社會秩序的紊亂起見，隋文武一以嚴治、軟化、節儉、愚民爲事。然當久亂之後，急切難復，所以終隋的較短期間，仍屬積重難返。及至煬帝窮極享樂，巡幸江南，搜求玩物，徵發倍至，遠在浙江，此時固爲運河所達，剝削隨至，無可避免。如於江南採木，尤爲擾民，非但重征平民，抑且搜括大族豪宗，及至民不聊生，天下再亂，東起遼東，南暨閩海，揭竿而起，四方響應，在今浙江的無慮多起，如（一）高智慧

自號東揚州刺史，(二)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十萬，(三)吳人朱爨，晉陵人管崇，擁衆十餘萬，自稱將軍寇江左。(四)東陽人李三兒向但之舉兵作亂，亦至萬餘等，振臂一呼，應者雲集。足徵隋政苦民之甚，而劉元進的起事，尤可視爲以浙江爲中心的革命，結果爲王世充抗於黃亭澗者三萬人，亦云慘矣。餘黨保險爲盜，如李子通、沈法興輩，皆據今浙江之地稱兵作亂，和隋代相終。

論及隋代運河的開鑿，在當時雖爲傷民的苦役，而在後世，實爲利便的偉績，惟是以作爲遊幸的通道，誠爲「重苦吾民」的虐政了。隋書：「大業六年……勅穿江南運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可以勝千斛之舟，大抵其時江南漕運，兼及浙西，再則商業發達，有賴交通。唐承隋祚，貞觀開元兩期，號稱極治，戶口增加，社會繁榮，惟仍屬上層的表面之興盛，所以經不起摧殘，安史和黃巢的先後兩次事變，便斷送了唐家的天下。惟唐時越州等地，稱爲「天下殷富之處，」浙東更屬「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兩浙蔚然爲中國經濟重心之所在，朝廷命脈之所繫，白居易說：「當今國用，半出江南，」可以想見當時殷富。及至晚唐，黃巢造反，浙江曾被波及，而有唐一代在浙江的叛亂，亦有多起，如：(一)廣德中，袁晁亂台州，盡有浙江之地，袁倬、王栖耀討平之；(二)貞元中山賊栗鑠誘山越爲亂，陷浙東，裴肅率台州兵討平之；(三)大中中劇賊裘甫亂，王式擒斬之；(四)乾符四年，浙

西狼山鎮遏使王郢作亂，五年曹師雄寇湖州，皆爲裴瓌所平，可視爲朝廷橫征苦役的結果，山越此時尙圖反抗。然上所敍皆爲安史之亂以後發生的事變，朝政衰落，依賴江南益深，致爲征斂太過，民衆忍受不了，遂起叛亂，幸皆無害於浙江的全般推進。此外嘉興一帶，自來號稱澤國，而杭州在宋前尙視爲有害健康的沼澤之地，然衣食之倚賴愈甚，則維護之功不可或少，內而水利，外而海塘，實爲應有的建築上之努力。相傳范蠡已掘地溝，通江海，（古代江海之間，中亘陸地，江水無可宣洩，遂致泛濫，下游兩岸，屢成澤國。見海甯杭辛齋所著「治塘芻議」）保障田廬，利濟舟楫。秦漢之後，方始有防海大堤之議。水經注載錢塘之成，由於「土斛錢千」之故。海塘始築的年代，未見記載，但有開元元年（西元七一三年）重築鹽官（今海寧）海塘二百四十丈之文，則是非原於隋，亦當肇自唐初。其後吳越、宋、明繼之，海塘之興建，乃遍於兩浙沿海地方。浙西沿海各屬的海塘，尤爲此後所重視，因爲潮大岸削，海塘屢修屢圯。至溫台一帶，興築較晚，又始終安瀾，未嘗爲患，此與地勢岩岸，至有關係。惟考沿海一帶，常有桑田滄海的變易，大抵海寧海鹽一帶，自唐以後，內陷之蹟顯然可考，紹寧沿海一帶，亦有漲陷的間接記事。又潮汐時大，則往往決塘爲災，所以鎮海每用鐵符（鑄鐵象牛）以厭潮勢。唐末神僧更翻浮圖以鎮潮脈，名六和塔，事涉迷信，塔數廢興，但迄今仍爲浙江的古蹟名

勝之一。

隋唐的浙江海上交通與商業

中國古代向外交通，有陸海二途，陸路通西域的時期，略相當於海道之通日本（皆在漢初，惟史記載有始，是在鄧縣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的話，則是海道當較早），至由海道通於西南各國，或當較晚。當時敍利亞人、波斯人，先後握海運之權。三國至東晉期間，通商之外，兼為巡禮佛蹟，所以往來頻繁。下逮李唐四百年中，中國商船，常與波斯同握海權，而錫蘭則居東西海上貿易的樞紐，我國商船遠航錫蘭以西的波斯灣、紅海一帶，其時中國海舶，多建造於寧波，船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按寧波在古代早為海港與造船港）。中唐以後，大食商船代之而興，當其通商中國的期間，多集中於廣州，但江南揚州，貿易亦盛，大食人留者很多。寧波除與日本、高麗通航（不限於通商，見下節）外，尚有環王國（占城）、尸利佛逝（三佛齊）與占卑（蘇門答刺的西部）等國，前來通商。杭州其時海口未淤，所以有大食等外蕃人的蹤跡。吾人研究中國最早海港和海上的經營，當推越王勾踐，彼當沼吳之後，橫行江淮間稱霸主，起觀台於瑯琊，以望東海，瑯琊

是否爲今日山東日照東北海岸地方，尙成問題，但開關的和具有最早航海歷史記載的，則不能不推住居浙江的越人。加以造船事業（指海船而言），又不得不推浙江爲最早，寧波交通海外，在越時爲海港，亦自有其可能（即使不可能，則秦時必爲海港，當無疑義）。其後又有漢武帝詔會稽太守發兵援東甌以解閩越之圍的事情，史記但稱會稽太守發兵浮海赴援，未言出何海港，然依當時環境論之，當以寧波爲是。其後元鼎六年，因爲東越新立的王——善餘謀反，漢以水軍出句章（亦由之可以證明上次浮海出口之港爲同一地方），可見當時東南海上交通之繁，和浙江的句章之早爲交通港口。唐時阿拉伯人來華貿易，與中國遠航日本、南洋，皆極一時之盛，又唐初已設置「互市監」，開元二年，乃於沿海各地，改設市舶司，當時的市舶司，亦卽今日的海關，其時沿海貿易，揚州僅次於廣州，大食波斯買客數在萬人以上，不過通商地方，雖時有轉移，但市舶始終不廢，以是專司招攬，既有其人，蕃商來者自然日多，貿易自然日盛，惟浙江沿海，唐時無設市舶司的記載，故當時浙江容祇有造船工業和海上交通，而無特設互市的地方。可是杭州這時，商業較前大爲興盛，人口已在十萬以上，李華詩有：「駢橋二十里，開肆三萬室」之句，駢橋如斯之盛，開肆如斯之多，說是僅爲國內貿易，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日本的漢化與其以怨報德

隋唐時浙江對海外交通的重要，其影響後世的，不在西南各國，而在日本和高麗。唐平高麗，大敗日本，自是日本遭了實際的教訓以後，震於唐之威德，不敢過問朝鮮事，而與中國的交通，亦竟不敢循出朝鮮以達中國的故道，而但取海道以達於山東、江蘇或浙江的沿岸，其中最後一道，爲自日本筑紫直橫渡東海而至寧波，爲倭遣唐使所經由的航路，唐代護照稱「過所」，今日本滋賀縣圍城市中，尙藏有智證大師圓珍遊唐所持的過所，乃越州都督所發給，三處蓋章，均有一「越州都護府印」。越州卽今之紹興，自寧波（唐時稱明州）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轉趨京師，所以越在當時，爲必經之道。而自日本航中國，以博多（今福岡）或長崎爲起點，橫斷中國東海，終止明州，大都利用季風的力量，來自多在秋末冬初，回時多在夏季（北宋朱彥涑洲可談云「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依於此點，日本來華以在寧波登陸爲最當，由之，造成寧波爲唐宋以來中日間交通的衝要。其他浙江地方，如越州、台州亦有日船寄舶，其時中國輸入日本的物品，以書籍爲最多，書籍之中，又以佛經爲多，考唐時日本遣使來華的目的，卽在此種

文化的輸入而此種文化與友誼的使節，曾鮮不純的動機存乎其中（當然唐代的聲威，遠非宋明清民國所能仰望，但由昔論今，日本的墮落，尤堪令人歎息。）而浙江人文對於日本的影響，可謂至要且鉅。我國自來以片面的恩惠施諸日本，實以浙江爲之樞紐。隋唐以來，初有學術的傳授，繼而兼有儒學與典章文學的轉輸，宋明之世，浙江更以地以人而造福日本不淺，如禪宗的傳入日本，始於唐代，固由浙江過渡，其後盛於宋代，更淵源於浙江，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西元一一八七年）日僧明菴榮西再次入宋時，曾就天台山萬年寺的虛菴懷敬學禪，卒嗣其法，宋孝宗賜以千光法師號，榮西於一一九一年歸國，乃將臨濟禪宗傳入日本，建壽福寺於鎌倉，而爲日本禪宗的始祖。宋寧宗嘉定十六年（西元一二二三年）日僧希玄道元入宋，歷訪徑山，天童山諸名禪，卒於一二二七年。傳曹洞禪宗的正脈而歸，爲日本曹洞宗的始祖。惟榮西所倡導的非純粹的禪宗，至日本純粹禪宗的傳入，則爲宋禪僧道隆（宋陽山僧）元菴普寧（浙徑山僧）大休正念（亦徑山僧）西澗士曇（浙天童山僧）無學祖元（徑山僧）境空覺圓（徑山僧）先後東渡的結果，除宋陽山外，徑山、天童山，皆在浙境（餘杭徑山，錢塘靈隱，淨慈，寧波天童育王等，爲禪院五山。）其中普寧德望尤隆，影響最大，王輯五氏嘗考論純粹禪宗的鼓吹的嚴正寡慾禪規，因爲與尙質樸的日本武士相與契。

合，前者乃爲後者所感動以是當時幕府中的人物自北條時賴以下的鎌倉武士，皆皈依禪法，參禪究道，結果日本武士道精神，遂漸爲禪宗所同化，習得禪門之生死念頭，打破生死關頭，元軍東征，未遭大難，嗣後更變本加厲的好狠鬪勇，可爲近代極端的軍國主義者，此屬太過的結果，非禪宗之過。又同時宋學東渡，對於日本國體和民彝，亦有影響。而其後關係最大的，斯爲王陽明的「良知學」之輸入日本，王氏學術實用化的結果，和朱舜水的留日設教，對於近代日本的締造，最有大功，此爲不可否認的事實，日本自家也予以承認。不圖日本近代國強以降，遂漸墮落，反以怨報德起來，良知喪盡，侵略上國，浙江更首當其衝，明代倭寇肆虐浙江沿海各地，使浙江遭受最慘重的蹂躪。而民國二十六年倭寇以突破淞滬我軍防線不成，乃自浙江全公亭登陸，師其向日倭盜的故技，繼陷浙江東北一隅，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論文：

張其昀 浙江省人文對於日本的影響

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三卷二期

王輯五

宋稗僧與日本武士

治史雜誌第一期

武育幹

中國國際貿易史

張道藩

寧波市在國際通商史上之地位 國風三卷九期

隋書

浙江通志

第六章 五代吳越國的偏安一隅

五季兵連禍結下的浙江

唐自天寶以後，內而藩鎮跋扈，外而患頻仍，加以宦官的暴橫，賦稅的苛擾，天災的流行，以至民不聊生，而有變動多起。黃巢以一匹夫，嘯聚數十萬衆，殘破州郡，塗炭海內，藩鎮乘之，經三數十年的陵夷，以漸致唐室於覆滅。中原之地，自李唐亡至趙宋興，五十年間，歷朝五姓八君十三，而割據各方者，前後又十國。兵連禍結，紛亂無已，興廢塗炭之甚，爲前此所未見，尤以黃巢亂後的數十年中爲最慘，而在中原的破壞爲最重。所以五代期間，乃又形成人民移徙的局面。特這一次的移徙，中原人士歸於淮南、嶺表、西蜀，似比之江南爲重要（大抵江南亦爲兵連禍結之地，孫孺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遮斷浙江與中原的交通。）然浙江仍不失爲當時中原仕族避難的淵藪。宋人葉水心云：「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有幾族，故以十五

州之衆，當天下之半。」則是吳越國的人口，已爲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浙江一省，至少應爲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

錢鏐割據浙江，誠能南破黃巢，北戰境外，割據自立，免於戰禍。自錢鏐至錢俶，凡歷五主八十四年，錢氏之所以能安居一隅，歷時百年，以與中原連繫，供奉不絕，周旋四方，保境爲務，而鄰封南唐王閔，亦尙能自安之故。尤以浙江境內的農商之所出，足資供其自奉奉人而有餘，後人因爲彼能在浙講究水利，築捍海塘，休養生息，不事兵革，勝蹟有存，苛政不彰的緣故，多歸美之。實則瑜不掩瑕，其橫征暴斂，比之其他各國，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按吳越備史十國春秋所記，錢氏數世，誠有減賦除租的命令，然江表志、閩談錄及五代史，則皆有其重斂苦民的記載。）歐陽修的五代史吳越世家云：「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穀，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已則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傲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可見其時浙江的苟免於兵革，是付了很重的代價，方始獲得。卽十國春秋中，亦有間接的記

述，如互景仿傳中有云：「當五代時，吳越以一隅之地，捍四方，費用無藝，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悉加額數倍。」抑吳越當時，更爲貪污官吏殘民以逞的世界，橫斂百姓，掠奪商賈，以供奉佛事，更大興土木，宗風曼衍，披靡一方，對浙江後世歷史，尤屬害多利少。蓋於六朝以來日漸增長的綺靡懦弱之風氣，益事推波助瀾，綜錢氏數主，皆佞佛法，自求多福，而以錢儆爲最。吳越備史卷四載有：「王儆崇奉釋氏，在國內飯僧數萬，建寺院凡三百所。」浙江佛國的山來，實緣於錢氏普遍的倡導（六朝時，浙江佛風已盛，但大抵多涉於上層士庶階級。）

至於貢事中朝，僅就宋太祖、太宗兩朝，依同書根據貢奉錄，記其大者：「如赫黃、犀帶、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黃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兩，綾羅錦綺二十八萬餘匹，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四千餘事，珊瑚樹一高三丈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磔二百餘斤。」凡此何莫非民脂民膏貪污苛斂的結果（同時亦可以看到當時海外貿易之盛。）及宋統一的初年，所除浙江苛雜甚多，浙民始克稍蘇。

錢氏治浙對於文化的建設

錢氏在五季十國之中，對於治民，雖屬一邱之貉，但依然爲能於苛斂之下，維持一比較安定的局面，使人民作苟延圖樂的生存（新史吳越世家有云：「雖民生以是而得安，惟國力終以是而漸貧。」）更於當時天下擾攘之中，使吳越作爲當時文化的中心之一，陳蹟遺愛，迄今多有留存。當時疆域所屆號十三州（有一時期爲十五州，在內包常潤，而在浙者僅爲十一州，）北會與楊行密爭常潤，終止於蘇州。其後又乘閩王氏之亂，復兼併福州，而依以根據的十三州，爲杭、蘇、越、湖、衢、婺、台、明、溫、秀、處、睦、福（秀州向屬蘇州，吳越時乃以蘇屬之嘉興海鹽華亭析置，）時杭爲西府，越爲東府，夾江並建，而杭實爲國都。先是杭州海潮逼城，又錢塘江中羅刹石爲梗交通，錢氏乃鑿石填江，築塘營閘。於是沮洳斥鹵，化爲樂土。其中築石塘，開河渠，厥功尤偉。水利旣興，具區乃成。丁文江於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一文中，有云：「在唐以前，錢塘江與揚子江之間沿海，都是鹽塘，同現在江北開鹽墾的地方，差不多，直等到錢鏐築了海塘，沿海的田地，漸漸的成熟，南北運河一通，絲米都可以出口，江浙兩省纔成了全國最富庶的地方。同時這兩省所出的人物，也就駕於各省之上。」元代任都永水

利讓云：「錢氏有國百餘年，祇長興間一次水災，宋南渡百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一次水災。」從積極消極兩方面，可以見到錢氏興建水利的功績與影響。所以論者說錢氏的功業，實開蘇杭上比天堂的基礎。又以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隔絕吳越與北朝通道，錢氏乃由東海通北朝以及契丹、日本、新羅諸國，又與西南諸國貿易，且能軼駕隋唐，突過前人。海舶隨潮而至，四方珍異畢萃。

至於崇信釋氏，柔靡風尚，前節稱其影響後世，弊多利少。但論者謂其多造寺塔，點綴湖山，似亦不可厚非。朱竹垞曝書亭記云：「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於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於宮中，治烏金爲瓦，繪梵寶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忠懿王弘俶，曾做阿育王故事，作八萬四千塔，內藏寶篋印心咒經，頒行於各地（杭州雷峯塔及湖州天寧寺，皆有發見。）所造寺塔數目，難以悉計。但至今所存，即以杭州一地而論，如海會寺、昭慶寺、瑪瑙寺、清澗寺（玉泉所在）、淨慈寺、理安寺、雲棲寺、雷峯塔、保俶塔、稻光庵等，皆爲吳越時所建造（浙江各地所有的寺塔，大都建於吳越和南宋。）至於前朝舊寺，亦每因錢氏而恢宏。尤以由日本齋來經典，復興天台宗一事，著稱於世。中日交通史引皇朝類苑語云：

「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假買書於其國，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迄今天台教大佈江左。」自釋道立場講來，厥功誠偉。

區域精神的表現和完成

浙東西的形勢，漢晉之間，浙東每兼閩地，而浙西常隸於江南，建牙於蘇、寧。唐時始立兩浙之名，其以杭州建都，統轄今浙全省，實以吳越國爲最早。五代之亂，南北之人大事轉徙，其中英傑，乃有割據於江淮以南者。除錢鏐楊行密二人外，其餘多屬北人。錢氏之王浙中，對於區域精神，實予以相當的表現和完成。加之中原漢人多年移入浙江休養生息的結果，此時方得形成其特色。考浙江在建置史上，有數度偏安之局的形成，最早的一次，爲春秋越國。第二次則爲吳越國的興起。其後則有南宋的建都，而吳越實爲其中堅。杭州兩次建都，又以吳越錢氏開其端。蓋杭州自此始得與聲華久著的蘇州，連鑣馳驅，並稱人間福地。而浙江經濟的重要性的，在此期中，得完成其對於中國支柱的作用。人口既庶，財源大闢，尤以通商關係，而富甲天下。又若對於佛教的推廣，塔寺的建造，和增美湖光，柔靡風尚，吳越國更爲南宋和後代的先導。所以注意於彼時的經營和建設，很可以有助於了解其後

浙江一切方面的進展與形成。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論文：

夏定城 吳越錢氏之文化 文瀾學報第一期

唐遠曾 五代十國正賦苛捐考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二卷二期

五代史

吳越備史

浙江通志

第七章 閩越反爲天下中的浙江

北宋時的浙江農工和商業

浙江在中國的重要性，愈後而愈爲顯著。自吳越以降，幾近千年之中，經濟文化，已蔚然作了全國的重要中心之一。浙江在宋時爲兩浙路治，北宋時的兩浙路，有府二（平江鎮江）、州十二（杭越湖婺溫台處衢嚴秀）、縣七十九。南渡後復分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江陰一軍爲西路，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爲東路。在今浙江者，浙西爲臨安、嘉興二府，安吉、嚴二州，浙東爲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四州。北宋有縣六十六，南渡後，添慶元一縣。北宋之世有如中唐以後一樣，重倚東南漕運，惟歲額則倍增於中唐。全國以六百萬石爲額，兩浙占四分之一，所以其時兩浙已爲全國農業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中心爲淮南）。大抵浙東西，此時水利最稱發達，承唐吳越之餘蔭。凡浙西之太湖、西湖，浙東之鑑湖、湘湖、東錢湖，水利咸闢。加以地沃而物夥，刈麥和種

禾，一歲再熟。稻有早晚，因地制宜，所以產物富饒，衣食天下。工業在北宋時，已見起色，最重要的凡鑄錢、染織、造紙、造船等等，在於兩浙皆盛。鑄錢依宋會要所列，當時全國共有二十五監，浙江則有睦州神泉監，因為原料所需，對於在浙早具歷史的銅鐵冶製業，迄未衰歇。染織工業則湖州有織綾務，熙寧七年，兩浙一路歲上供帛至九十八萬匹。其時造紙工業亦集中今浙蜀兩省，浙江有剡藤、剡碓、玉版紙多種，應用更廣。陶瓷製造的著名工廠，在浙江的很多，如處州的祕色窯、哥窯、章龍泉窯、麗州窯、杭州的餘杭窯、安吉的碎器窯。造船工業亦稱發達，在浙江的船塢，有明州、婺州、溫州、台州等地，其中明州且為自來全國造船的中心。北宋商業更其盛極一時，國內商業的重心，在浙者為婺州、溫州、台州等地，國際商業的重心，在浙者為明州、杭州、溫州，全國先後所置的市舶司有六，浙江即占其半（為明州、杭州、秀州三處，餘三州為廣州、泉州、密州）。宋史地理志云：「餘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貝外國之物，頗充於中藏。」當宋之世，以薩拉森帝國發生變亂，波及西亞一帶，陸路貿易停止，而但恃海道為主，真宗咸平三年（西元一〇〇〇年）重開杭州，明州為對外貿易地，設立提舉市舶司，以監督外國貿易，其職責為掌管貨海船征權貿易的事務，以來遠人通遠物，當時泉廣二州為其中心，但杭州等地，亦充滿了阿拉伯波斯南洋各國以至非洲的商人，每年海船往來，非常之多。迨及南宋，更

獎勵海外通商，以補直物資之不足，乃大有助於國用，當時稅收所入，據王應麟玉海所載，每年常在二百萬緡左右，兩浙既屬富庶，對國家的負擔常重，僅茶鹽酒稅已占歲入錢三百三十餘萬緡，當時杭州人口，已超越蘇州的數字，天堂之名，由之以起，（袁駿楓窗小牘云：「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堂。」）至於居室飲食遊蕩的僧越，更甲於全國各地。咸淳臨安志卷五四載樓鑰錢塘縣壁記云：「錢塘古都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驛於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昔。」故南宋時的杭州代替了唐時的揚州，而杭州之真正地成爲地上天堂，亦自宋室南渡，變爲政治的中心始。

農民經濟破產下的方臘事變

農工商業既盛極一時，則兼併亦因之而日甚，當時操政權的人們，多半以貪污而廣置田產爲大地主，如蔡京、童貫、朱勛等，皆廣有浙西田地，動輒千萬畝，以致土地集中過甚，小農生活愈艱，而其時朝廷上自天子，下至地方官吏，更淫奢享樂，杭州時號「酒肉地獄」，當其必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而無疑。北宋末代二三帝王，更不知禍至之無日，而大興土木，築造宮殿，窮極奢靡，徽宗——此風雅帝王，更垂意花石，玩物喪志，身死異國，朱勛卽以此深得帝幸，在浙中肆意搜括，

網羅珍異，凡士民之家有稍堪玩賞的一石一木，即派人徑入其家，標舉發行，人民一預其役，即遭破產或鬻賣子女，流毒州郡者，先後達二十年之久，號稱「東南小朝廷」。政和中尤甚，淮汴之間，舳舻相銜，號花石綱，用致毀橋斷漕，糧運不繼。浙中除玩石的騷擾以外，尚有花、竹、雜木、海錯，所有珍異，一體豪奪漁取，悉奉禁中，擾民既甚，暴動遂起，加以鹽酒官買，借道侵漁，比比皆是，人禍既烈，天災洊至，政和六年江浙大水，宣和六年秀州又大水，流斃塞路，農村破產。而在宣和二年十月，睦州（今建德）清溪民方臘以漆圍造作局，屢爲官府酷取，於是遂利用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的機會，以誅勳爲名，用宗教組織民衆，起而反抗政府，旬日之間，即聚衆數萬，後至數十萬，所攻陷的地方，除睦、歙、杭、處、徽、婺六州外，尚有五十二縣，所到之處，焚殺掠奪，人物一空，如捉獲官吏，必處以極刑，資爲洩怨的出口，氣筒，此實「官迫民反」的結果，宣和五年，方變始行蕩平。「致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絃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宋史曾布傳）誠可謂爲一次鉅大的民變和慘重的劫運。

金人南下和浙江兵燹之劫

內憂之餘，繼以外禍，浙江在北宋末年，備遭兵燹之劫。女真阿骨打於宋徽宗政和四年（西元

一一一四年）叛遼不十一年而滅遼，不二年（欽宗靖康二年西元一一二七年）而陷汴京，徽欽北狩。趙構初卽位於南京（今商邱）繼逃揚州，金兀朮等分道南下，建炎三年，金兵越江尾追高宗（趙構）年終金人入建康，十二月十六日陷杭州，大肆焚戮，同日高宗浮海避敵，十二月二十日金人降越州，二十七日初犯明州，爲張浚所卻。建炎四年正月七日金人再犯明州，自十六日起至二月三日方去，二月初並遣人四面放火，明州城中，惟東北角數佛寺和僻巷居民，偶有存者，金兵更引兵破定海（今鎮海）以舟師絕洋，劫昌國（今定海）復欲攻象山，至碇頭，風雹大作，被阻折回，惟在金人犯明州的前後，宋兵更殺人擄，毒甚於虜，明州、定海等地，皆成灰燼，而張浚棄守明州，引軍南趨溫州，道路鷄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逃奔山谷，數百里內，寂無人煙，足見斯役浙土之爲橫遭蹂躪，所幸金人與也勃然，得地不守，旣而飽掠北歸，在歸途中，金兀朮因一厄於岳飛牛頭山之役，再厄於韓世忠黃天蕩之役，自是不敢輕言南下，以窺江浙。而趙構乃得於播遷多年之餘，終於紹興二年，還於臨安復位，是爲南宋建立之始，十一年奉表稱臣於金，納款獻綬的結果，得以保有江南，計歷七帝二王，偏安者一百五十六年。

南宋時臨安之豪華蓋世

王船山云：「宋人非獨自喪，且喪天地分建之極。」宋前但有亡朝而無亡國之事，有亡國則自宋始，但其時人懷義憤，士切同仇，排外思想，竅以引伸，這種民族思想忠義精神，則是以今浙江爲策源地。但此種思想和精神，在南宋之世雖能苟延民族的命脈於一時，但不能阻元兵鐵蹄的蹂躪於最後，馴至亡朝覆國，百年纔復，我們今日乃不能不歸咎於當時君臣苟安的心理，鑄此大錯。但苟安心理之發榮與滋長，又不能不追溯當時湖山柔靡，環境富庶，以致居移氣，養移體，日月推轉，雪恥復地的壯懷烈志，竟日漸凌替，而歸於消失淨盡。追憶當時的豪華，今日尤免不掉油然而興一番悵觸之感。當年趙構不都恢復形勝遠在杭州之上的建康，原是一片私心使然，而當時杭州人口經濟皆爲東南中心之所在，交通便利，居危思安，又相傳金主亮之起意想立馬吳山，爲着柳耆卿望海潮中的「三秋桂子，十里荷香」兩句話，誠然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而登峯造極，則在南宋建都之時（紹興八年始，即西元一一三八年），秦漢隋唐古城，大約在今留下，今之杭城，其間則爲巨浸，自隋始置杭州城，依鳳凰山而立，逼近錢江，唐仍之，錢鏐於唐末（唐昭宗大順初）始築新

夾城，環包家山泊秦望山而迴，凡三十里，三年後又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卽上之新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卽西湖）霍山（寶石山北）范浦（艮山門外）凡七十里，羅隱所謂襟江帶湖，卽外郭也。南宋因錢氏故址，建行宮於鳳皇山，其內城紹興二十八年築，亦曰禁城，周九里，外城門十三，時東門彌望皆菜圃，西則引湖水入城，以小舟散給坊市，嚴陵富陽之柴，聚於江干，蘇秀米自北關而入，故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離宮別館，則有德壽（今宗陽宮故址）玉津（今南新橋之西包家山下）富景（今羊市街附近）聚景（今清波湧金門外）宮苑之盛，與禁城同其壯麗。自禁城北門（和寧門）至笕橋爲御街，市肆無物不備，人口富庶，大抵有人口百十數萬。街市櫛比，全城分爲十市區，每區有大街一條，橫貫城之兩端，城內溝洫小河甚多，橋樑之數，約達二千（馬可孛羅遊記稱有橋一萬二千），河岸有許多石築之堆棧，容積甚大，海舶所運來的貨物，皆屯貯其中，以應市區需要，市肆又以貨物而分地段，凡國內外的商業，皆異常繁華，城內手工業發達，工人數目很多（馬可孛羅遊記稱百工分十二行，每行從事工作之工人凡一萬二千家，每家最少十二人，多者二十人至四十人不等），所有街道以及其他大道，俱用磚石鋪砌，大道皆能通達全省，馬可孛羅遊記更稱：「商人之繁多富裕，以及經手貨物之衆，其爲數之鉅，更僕難盡……所有浴室

約三千所，用水俱恃井泉。……男女風度翩翩，所著以綢緞爲多。……當地人士以所受教育及國王以身作則之故，性質和平。……泛舟湖上，固爲居民游憩之良法，而馳車街上，又爲居民消遣之一道也，大街上遊車往來，絡繹不絕。……可以想見其盛。他如戶口登記，已經施行，防火規則，甚爲嚴密。又有大學一所（紹興十三年成立，至少帝德佑二年宋亡遂廢，共經一三四年），係就岳飛第宅爲之，在紀家橋東（今浙江高等法院附近之地），南宋中葉，生徒人數曾有時至千七百餘人，今日歐洲所有大學，皆較此爲遲。至於都人遊賞，則以西湖爲中心，「貴宅官舍，列亭館於水隄，梵刹琳宮，布殿閣於湖山，」自帝王以至庶民，游幸湖山，直無虛日，衣錦酌酒，留連忘返，真是所謂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園，以致耽樂之餘，無復新亭之淚，當時士子林升題一絕於旅邸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武林舊事有云：「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賈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騷子，密約幽期，靡不在焉。日糜千金，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以此奢華淫靡，乃促進了其間歌曲音樂和一切技藝的發達和精到。周密武林舊事序有言：「乾道（孝宗）淳熙（孝宗）間三朝授受兩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豐享豫大，至寶祐景定，（理宗）則幾乎政宣矣（政和宣和徽宗年號）。」既而曳裾黑邸，耳目益廣，朝歌暮嬉，酣玩歲月，

意謂人生，正復若此，初不省承平樂事爲難過也。及時移物換，憂患飄零，追想昔遊，殆如夢寐，而感慨係之矣。」

南宋的文化風尚及其他

唐及北宋，中國經濟的中心已潛移於江南，中原僅爲政治的中心，而需依賴江南的供應以衣食天下。及至南宋，漢族的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乃合而爲一，百五十餘年之間，造成「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繁華。杭州建都以後，中國文化中心，亦自汴洛之間移於東南沿海。茲分下列各端言之：

(一) 國計民生——張蔭麟綜之爲土地之集中於貴勢之家，楮幣（卽紙幣）之濫發而低折，與「和糴」「和買」之病民，事雖泛論全國，但浙江爲立國之本，依據所有記載，表現於此三端者，最爲嚴重，而酒稅、鹽稅、差役法、身丁稅等，當以浙江爲最苛重，後者可以折絹，無產下戶，一樣負擔，范大成云：「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徒以強隣壓境，兵屯日甚，不能計財惜費，朝廷既多所征斂，乃所象養的驕兵悍將，亦在在足足以爲害民生。

(二) 商業與交通——金陷汴京，宋室遷都，擬藉海外貿易，以助國用，雖屬政治不良，保護不周，

但其時浙江內外貿易很盛，臨安因政治的關係，同時爲商業的重心，其他沿海商埠，則有明州、溫州、澈浦（馬可孛羅遊記稱「澈浦去行在二十五里，有一鎮，港灣至佳，船舶雲集，此種船隻，大都往來於印度及其他諸國，載運與本城有利之貨物，出入其間有一大河流貫行在及海港之間，船舶可以直達行在。」是澈浦爲其時國都的外港。）明杭（咸淳臨安志卷九載「市船務在保安門，海商之自外舶至杭者，受其券而考驗之」）等地，各置提舉市舶司，以司理與南洋諸國商人來華貿易的事情。浙江交通，在南宋時頗稱發達，明、婺、溫、台、四州，皆設有造船場，明、溫等地則爲海舶寄碇之所，其時中國船隻，航行海上的很多，較蕃船爲大，往往可載至千人，其中大部分爲造自浙江寧波。吳自牧夢梁錄並載西湖有車船「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足見其時浙人造船技術進步的一斑，又其時明州澈浦並駐有水軍。

（三）學術與人才——私家講學，盛於北宋，書院講學，盛於南宋。時浙江書院金華有麗澤，寧波有甬東，衢州有柯山，清獻，紹興有稽山，淳安有石峽，一時稱盛。私家講學，更所在多有。宋代理學，爲由於儒家學說融釋道哲學而後復興的結果。兩宋承五代之後，志切匡時的人，都想以儒家學說爲挽救人心之計，遂雜採釋道思想以成心性的理學。其地點自以浙江爲適宜。南宋之世，理學最盛，朱陸

之學，皆流傳於浙江。明州淳熙四先生（奉化舒璘，定海沈煥，鄞袁燮，慈谿楊簡）張象山之緒，南宋末年，有徐霖其人，大倡陸學，陸學爲之一盛。朱子門生遍於浙中，當時有所謂金華系、義烏系、四明系等派，其中金華系以黃幹爲始，幹傳何基，以至於王柏、金履祥、許謙，世稱「金華四先生」。到元朝則有柳貫、黃潛、吳萊，明則有宋濂、方孝孺一脈相承。延至四百年之久，而與朱陸鼎足爲三者，則有永嘉學派。此派由鄭景望、薛良齋首倡於前，陳止齋、陳龍川、葉水心繼起於後，而水心尤爲該派中的生力軍，鑑於空言性理，無補時艱，乃轉而以經世事功爲主。至如胡安定（瑗）講學吳興，務在沈潛賈藝，干利之習，置經義治事兩齋，諸生各就其志，以類羣居，師儒之道以立，天下取之爲式，關係一代學風至鉅。

又由印刷事業的興盛，亦可以反映出文化的發達，唐宋以來，浙江一地久已成爲全國出版業的中心。宋版書的名貴，爲世所珍。所以王靜安先生有云：「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南宋以後，浙江人才數量，常在江蘇之上。北宋時江蘇佔全國人才數量百分率爲六·六，浙江爲五·七，至南宋時，建都臨安，浙江驟然增至百分之二十二·五。其後縣縣至於今日，依然繁盛無替。朱子鑒於此時東南學者的蔚起，所以慨然言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下之中。」

本章主要參考書誌論文：

張家駒 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國南方社會（食貨）

武育幹 中國國際貿易史（商務版）

李文治 北宋兵變之經濟的動力（食貨）

朱希祖 高宗六龍幸海記考證（文潮學報二卷二期）

光演子 中國民族志

馮巽占 杭城沿革考（地學雜誌）

向達 元代馬可孛羅諸外人所見之杭州（東方雜誌二十六卷二期）（國風）

張其昀 南宋杭州國立之大學（燕京學報第二十期）

張蔭麟 南宋亡國史補（大陸雜誌一卷二期）

魯通 浙江學術源流考（大陸雜誌一卷二期）

陳安仁 中國近世文化史（商務版）

浙江通志

宋史

南渡釋史

第八章 有明一代的浙江倭寇

蒙古鐵蹄下的浙江

蒙古族崛起漠北，先後經成吉思汗、忽必烈征戰的結果，亡夏滅金，兩次西征，歐人震撼異常，目爲黃禍。西元一二五七年，憲宗蒙哥南下攻宋，死於軍中，其弟忽必烈從賈似道之請，與宋議和。一二六四年，忽必烈（元世祖）奠都燕京，不久改國號「元」。度宗咸淳七年（西元一二七一年）遣伯顏伐宋，九年陷樊城，降襄陽，十年大舉南下，德祐元年（西元一二七五年）元軍乃由獨松關入浙，二年正月，伯顏次皋亭山（杭人呼爲半山，在今杭縣東北二十里）宋室奉表以降，伯顏擄少帝等北去，文天祥等繼奉趙昀，趙昀於閩粵沿海，一二七九年終亡於元，浙江於元時，初建兩浙都督府，尋改爲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轄今江蘇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浙江福建全省之地，其在浙江有杭州、湖州、嘉興、建德、慶元、衢州、紹興、溫州、台州、處州等十一路，而建省設府之制，乃爲其後明清兩代

所因襲而無大改動，惟蒙古既得中國，深怕漢人反抗，防戒嚴密，於當時宋都所在之地的杭州，馬可孛羅曾記每橋守以邏卒十人，用防叛亂，以時敲梆擊鑼，並規定居民息燈時間，又稱南宋一千二百城中，俱遣戍軍鎮守，兵數最少亦有一千人，其他則一萬人二萬人以至三萬人不等，戍軍不盡爲鞏韌人，來自契丹省者亦復甚衆，又稱在行在境內，所徵鹽及貨品及其他諸物之稅，其總額占全國九分之一，凡所云云，當爲可靠。元史崔彥傳有云：「江南理財，積欠逋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隣，惟錢塘受害最慘。」大抵蒙古人以劫奪財富爲目的，而錢塘則以其號稱富庶，且爲宋都之所在，因之壓迫備至。他如移江南宋室大臣之家於內地，所有官長皆引用蒙古人，和色目人，關於滅宋所得的南人，列爲第四等（第三等爲滅金所得的漢人），又分民爲十等，儒與娼丐同列，其時浙江當滅朝亡國之餘，所受凌轢，甚於他處。蒙古軍民，貴族，官僚，更憑政治上的權威，向農民強取豪奪，元史成宗謂台臣曰（成宗本紀）：「朕聞海內富戶，侵佔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平宋後，將宋之官田沒收（按多在平江一帶）分賜臣下或寺院。蒙人率皆迷信，既對寺僧多予便利，以是「浙西豪民卽所居爲廬，舉度爲僧尼，號其教曰白雲宗，」出家者非由信教，而因規避賦役，冒託名義，施產入教，實與妻妾同居，或恐削髮，而舍僧入道，或竟蓄髮如常人，以包庇其私產，而

施產者，亦並非爲護道，但以財產詭寄，實際並未歸入寺觀，此種人竟有衆數十萬，由之亦足以覘蒙古人苛斂之甚與僧富民貧之一斑，而番僧楊璉真珈，且於紹興等地，發掘故宋諸陵，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以竊取殉葬的貴物，專橫恣肆，道路以目。又色目人於元時有遷居浙江的，如哈刺魯人乃貢之居浙，輟耕錄亦云至元二十四年，徙乃彥餘黨於定海縣，夷夏之防，至是大壞。

元明時浙江的海上貿易

中國於元末，初鮮排外性質，但以胡元入主中華，政刑日苛，歧視漢人，至於忍無可忍之時，漢人乃挺而走險，發動革命，最先揭起反元大纛的，爲至正八年（西元一三四八年）黃岩人方國珍的起兵入海，劫掠漕運，至正十一年，征占溫州，勢益壯大，劉福通、郭子興、陳友諒等繼起作亂，元在江南北一帶的統治，大爲動搖，成爲四分五裂的形勢，朱元璋既代郭子興而起，至正二十七年，入征湖州等地，消滅張士誠的餘部，又征慶元，降方國珍，更北定中原，建都南京，其取天下甚爲易，則以江南各地，同族易爲吸引的緣故，元明兩代，浙江的海上貿易甚盛，元世祖時，浙江的澈浦、溫州、杭州、慶元（卽寧波）皆設有市舶司，（浙江之外尚有上海、泉州、廣州三處）以驗查輸出輸入，而取關稅十

分之一，粗者十五分之一。其後更選人赴海外貿易。當時阿拉伯人之由印度南洋而來，泉州、杭州等處通商者甚衆。慶元其時且有回教的禮拜堂，阿人居留者，必有相當數字，而元之經營海外，皆自慶元出發。國內漕米，初恃運河，自北平至杭州有一條貫通四省的大運河，後改海運。當時北平爲全國交通的中心，有大路通浙江的杭州、澈浦等地。明代對海外通商，亦頗注意，其地點在浙者，仍以寧波爲繁盛。明之初年，歐洲以蒙古帖木兒和土耳其人的先後西侵，致與中國通商一時中斷，直至發見非洲南端的新航線，歐人至東方的貿易，方再恢復。葡人先來，在廣東率先與中國通商，以其在上川島有不法行爲，中國當局所以封港，不准貿易，葡人轉向浙閩沿岸通商，在寧波曾設立商會，且成一小殖民地。嘉靖十二年，葡人因人多勢盛，故態復萌，又常發生掠奪行爲，十三年，特下令誅伐商人犯者約七八百人，並焚燬葡船三十五艘。二十四年，兩國又發生衝突，以是葡勢日衰。抑葡人未得立足於澳門之先，亦嘗暫時停居於浙之雙嶼等地。而倭人通華，依文獻通考四裔考所稱：「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商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明代寧波市舶所，寧與日本通商事宜。惟日本叛服不常，每借互市寇掠，所以對日互市，例有種種限制。當日本足利氏一代以至德川氏的初期（元順帝十六年至明神宗末年），日人之來寧波通商的很多。

(但同時以倭寇關係寧波以及浙海的通商受很大摧殘)嗣後稍衰。寧波外在浙江者温州、台州、紹興，亦常有日船來泊，惟多屬以劫掠爲目的的海盜船。

倭寇侵掠浙江沿海的始末

在廣義上講，倭寇可以包括日本的所有今昔軍閥、劇盜、無賴、游民在內。考明代最大的外患，爲北虜與南倭，而受南倭之禍最深的，則爲浙江，前後逾二百年，縱橫沿海都邑，幾半浙江，殺傷兵民無算，以致江南財富，盡被蹂躪，今舊蹟未除，新痕且殷。明代倭寇的來源，有武人，有海賈，有流氓，亦有中國失業人民附從在內。其衆狡而無信，悍而狠毒，加以通番奸民，爲其導引，作禍遂烈。而日本政府自元以來，輕視中國，對此種海盜的犯亂，往往加以袒護，甚或其政府自身行動，亦無異於海盜。加之，其國內政出多門，內亂無已，藉隣爲壑，以怨報德，真是人類歷史上一大污點。維時中國亦有可乘之際，陳懋恆列爲武備廢弛，政治黑暗，將士卑劣三點（詳氏所著明代倭寇考略）。而在浙江，又特具有幾種因素：（一）海岸曲折，港灣迴環，便於倭寇的伺隙而動，而不利於我之防範。（二）明太祖卽位，據浙自雄的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其諸豪亡命，於是糾結島人入寇。其後倭寇的首領許棟、

汪直、徐海、毛烈等，皆屬浙邊土著，及其他浙海著名巨盜和治內大姓，皆與潛通，以是發縱指使，若乃駕輕就熟。(二)寧波、紹興爲日本入貢故道。如嘉靖二年，日本大內義興使者與細川高國使者，因爭貢而致寇變。此皆屬浙江一隅特殊的原由。考明代倭寇浙江，可以分爲前後二期。前期可以溯自元代，至明嘉靖初年，後期則自嘉靖初年，至於明末，茲分別略述如下：

(一)前期——元征日本後十餘年，倭寇初掠山東沿海。元史載大德元年(西元一二九七年)置定海千戶所，以防歲至倭船。又寧波府志載至大二年(西元一三〇八年)倭人與官軍在慶元路大街突，焚燬郡儀門及天宰寺。當時由倭使倭商，一變而爲倭寇倭盜的情況，可由浦江吳萊論倭一文中之見之：「嚮自慶元航海來，艘艦數千，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量，公然貿易，卽不滿所欲，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其致變之故，有由市舶官吏需索所致，海鹽圖經有云：「元末，寓公姚桐壽著書，謂近年市舶長吏，巡徼上下，求索百出，每番船至，衆皆歡呼曰：「丞治廂廩家來矣！」昨年善人憤之，至露刀相殺，市舶勾當死者三人，主者匿匿不敢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最爲本州大後患。」然終元之世，史無載及倭寇侵浙的事故(僅元順帝本紀載至正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二十三年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至是海隅遂安。)元亡明興，倭寇侵掠中國沿海，乃自山東而南。侵掠浙

江最先的紀載，爲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年）三月，掠溫、台、明州（溫州、中嶼、台州、寧波、永嘉、玉環）。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日本，以書抵良懷，良懷遣僧奉表稱臣，送還明台被掠人口七十餘。明廷比見倭寇日烈，三年，應李文忠奏，置浙江七衛。六年，依廖永忠奏，於沿海置重軍。十七年，遣湯和巡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五十九城，遙丁壯五萬餘戍之。總計明代先後於浙江沿海置衛十一（金鄉、溫州、磐石、松門、海門、昌門、定海、觀海、臨山、紹興、海寧），千戶所三十一（蒲門、壯士、沙團、海安、瑞安、平陽、寧村、蒲歧、磐石後、楚門、隘頭、新河、海門前、健跳、桃渚、爵溪、錢倉、石蒲前、石蒲後、大嵩、靠衛、穿山後、舟山、中、舟山中、左、龍山、三山、瀝海、三江、澱浦、乍浦），沿海巡檢司四十八，寨三十三，關四，產四十四，烽墩二百三十四。溯自洪武二年至七年，倭寇連年掠浙。十四年，胡惟庸謀叛被誅，坐與日本勾結。十九年，絕日本貢，嚴海禁，復著祖訓，列日本於十五不征之國。至永樂三年，始復令其十年一貢，用明勘合爲貿易交通的憑證，並代捕海盜以獻。然終屬表面的暫時的恭順，寇掠不時，邦交常絕。依陳懋恆所錄倭寇之條，自洪武二年至成化二年（西元一四六六年）約百年中掠浙凡三千四起，約每三年一起。惟猖獗日甚，規模日大，因於永樂十七年，在遼東望海塢爲劉江所痛擊，乃肆毒於東南。以正統四年（西元一四三四年）陷大嵩所，昌國衛，入桃渚之役，爲最慘絕。

(二)後期——此期中倭寇變本加厲，肆虐最稱慘重。而嘉靖三十年後的十年中，年年大舉內犯；攻城陷所，燒殺劫掠，極爲殘酷。計自嘉靖二年（西元一五三三年）至萬曆十六年（西元一五八八年），六十餘年中，掠浙六十六起，大抵年月相繼。且前期但在沿海地方，此期則深入內地，攻掠大城如紹興、杭州、永康等地。考其猖獗之故：（一）嘉靖二年，日使爭貢騷擾浙東，明廷於是罷市船司。以是華商倭人，私行貿易，時而因緣爲利，狼狽爲奸，時而分贓不均，有所短絀，在在足以激盪倭寇的恣肆和擾亂；（二）閩浙大姓，利倭走私，反嫉視嚴海防，絕貿易的官吏，於是排斥循良，益啓倭人覷邊的野心，而無所顧忌（朱統於嘉靖二十七 years 上書有言曰：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今日讀之益深沈痛）；（三）海上巨盜，此時並起，教獠升木，引狼入室。自嘉靖二年至三十年，雖時寇邊，但不十分嚴重，惟自三十年始，猖獗最盛，三十一年，焚燬黃岩，殺掠甚慘，後七日始出。三十二年，燒掠慈谿、海鹽甚慘，又陷乍浦、澈浦等地。三十三年，三陷嘉善，入崇德，掠嘉興、海鹽、慈谿、平湖、海寧、蕭山、上虞、溫州、樂清、台州、黃岩、仙居、永康、奉化、餘姚、秀水、歸安諸地。三十四年，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十里外，流血成川。是年五月朔，倭突犯嘉興，張經遣參將盧鏡，督保清兵，援以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柳湖出平望，以湯克寬引舟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斬

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以來，稱戰功第一。同年胡宗憲總督浙直，銳意主撫，以計擒陳東、葉麻，殺倭寇黨魁徐海。繼於三十六年，誘殺汪直，其餘黨雖仍剽掠各處，但領導無人，勢已散。三十七年，掠錢江南岸沿海各地，先後爲胡宗憲、譚綸、戚繼光、俞大猷所討平。三十八年及四十年，倭寇仍犯上列諸地，又爲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所擊敗，倭遂離開浙江。久經窟宅屯踞之所的定海、金塘等地南行，改以福建的鼓嶼爲根據，劫掠閩粵沿海。自後浙江雖仍偶有寇劫，但以海防嚴厲，不致大亂。明史萬曆十六年有云：「倭犯浙江，然時疆吏懲嘉靖之禍，海防頗飭，賊來輒失利。」誠爲紀實之語。有時城防關係重大，嘉靖末年，浙江府縣有城者四十，嘉靖時築者三十有二，至於崇寒堡隘的增設，爲數更多。又當時造船之地，多在浙江，如杭州、磐石等地，防範資用既具，飄忽的倭寇，當然無所施其技了。

倭寇禍亂浙江的影響

倭禍浙江殆二百年，掠劫百餘起，縣治被陷者五：黃岩、嘉善、崇德、慈谿、仙居。衛所陷者六：昌國衛、大嵩所、桃渚所、靈巒所、臨山所、乍浦所。村鎮被焚劫者以百計。當時影響國計民生，至爲鉅大。說者謂

明室之亡，異族之興，不得不認倭寇之亂爲其重要原因之一（按今日倭禍亦不得不溯源於此）而江浙更爲國家財賦中心，人文淵藪，遭此荼毒，靡有孑遺，廬舍財帛，人民生命的損失，殆難以數字計，國家地方原氣，到此盡斲。綜其對於浙江一省的影響：

（一）生命財富的犧牲慘重——關於這一方面，曾無記載，頗難得其確數。明史汪直傳中有云：「汪徐（海）二人，侵擾中國南部者十餘年，流劫濱海郡，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如樂清、黃岩、昌國、臨山、崇德、桐鄉諸城，皆爲攻墜，焚燔廬舍，擄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溝壑者，亦且數十萬計。」由此可見一斑。而小民既受倭寇的侵凌，復遭不法官吏與無紀客軍的擾害，黃臺之瓜，一摘再摘。以戶口爲言，茲依雍正浙江通志中所載爲製下表：（洪武時浙江戶口與嘉靖時浙江戶口作一對比，如無洪武時的記載，則上溯於元代的記載。——又元時之路相當於明代之府。）

府 別	元代或明初記載		嘉靖浙江通志		增（十）減（一）	
	戶	口	戶	口	戶	口
杭州府	五八,九五〇	一,八四〇,七〇〇 (元至元三年)	三,〇四七	五四,〇九二	(一) 一四,〇四三	上(一) 二,九〇一,二一九
湖州府	一四〇,〇六六	八〇〇,〇四四 (洪武十四年)	一七,〇七三	四九,八四九	(一) 二六,〇〇五	(一) 三三〇,〇九五
寧波府	三九,五五六	七三〇,〇〇〇 (洪武十四年)	三三,〇七〇	五〇,〇六六	(一) 八,〇一六	(一) 三三〇,〇四一

有明一代的浙江倭寇

紹興府	三六、〇七四	一、〇三九、〇〇五	一六、〇九〇	六八、七四九	(一) 一〇〇、三四四	(一) 三五、三三六
台州府	二六、四一五	一、〇〇三、八八三 (元史地理志) 一、〇八八、九九九 (至元三十七年)	〇、一六三	三六、一〇三	(一) 二六、三五七	(一) 七五、七〇〇
金華府	三六、三三八	五六一、九六〇 (至元三十七年)	一五、九三三	七四、七四二	(一) 六三、三三六	(一) 三六、八八元
衢州府	三三、〇八九	五六一、九六〇 (洪武二十四年)	九三、七二六	五三、三三三	(一) 二七、三五三	(一) 一三、三三三
嚴州府	七、四九九	三〇、八九九 (洪武二十四年)	五、六九九	三二、四三三	(一) 一九、八九〇	(一) 九、九九六
溫州府	二七、五九九	五九九、〇九九 (洪武二十四年)	二九、七三三	三三、六三三	(一) 六八、六六三	(一) 三三、四四五
總計	一、四九、三三〇	七、九四、〇〇〇	九六、一六五	四、一四三、八九九	(一) 五三、六三三	(一) 三、七九、一九五

附註 嘉興處州兩府以統計不全不列

由上表可見元或明初至於嘉靖間（按嘉靖浙江通志修纂期為起一五五一——辛亥，訖一五六一——辛酉之十年，其時倭寇勢最鴟張，未列之數，恐在不少），浙江戶口有普遍的降落。這當然以元明間的兵燹和水旱災禍時見為其重要原因。但百餘年中的倭禍，當亦為其原因之一。其中衛嚴兩府，少被倭禍，故其戶口的降落，似比較有限，若杭州、台州兩府，則為被倭禍最利害的區域，其戶口的降落特甚。則依此以為比例，財富的損失，當尤為可驚。

(二) 衛鄉禦侮精神的喚起——浙江自吳越與南宋兩朝建都以來，文化雖稱昌明，但佞佛頓

柔的風習，大爲滋長。倭寇初起時，民衆的相驚伯有，於當時人的議論中，可以見其時居民怯懦一斑。以是不斷的橫遭蹂躪，遂不得不征調全國各處的著名軍隊，如廣西的狼兵，湖南的土兵，山東、安徽、河南、河北、山西等處的北方兵，四川、廣東、福建等處的南方軍或水軍，以爲應變抗倭的主力。然此利之所在，害亦隨之，尤其此屬一時權宜之計，不可以語於長期守土。幸而在此期中，浙人以環境的刺激和磨厲，已能漸變其怯懦之風，而日趨於強梁。浙人抗倭，以處州的坑兵（按卽鑛工）最勇，而參加最早犧牲亦最烈（郎瑛七修類稿中有云：「浙惟處州召募者衆，死者幾萬矣」之語）而義烏兵最爲著稱，由於戚繼光的訓練，而成勁旅。明史記載：「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慍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又以南方多數澤，不便馳逐，乃因地形，制鴛鴦陣，長短兵迭用，一切器械，皆精求而更置之。節制詳密，號令嚴明，由是戚家軍名震天下。」於是「遂罷客兵之援浙者。又以之援閩，大小八十餘戰，無不全勝。」（戚繼光祭譚繪文）當時，平倭將帥，雖多他省人，然其後則多浙人，如胡守仁、陳大成、翁大立、萬表等，皆抗倭有功。而死烈之士，且不勝枚舉。此中嬾遞轉移之迹，可見於隆慶六年巡撫浙江御史謝廷傑奏議中語：「昔浙嘗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卽戎，妻子相涕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貨，而天下往往多稱浙兵。夫浙固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倭

夷始。」我們更可以爲之補充的便是再考察下一章所敘述的浙江民衆反抗異族入主中國的壯烈，更可以了然其抗拒精神的由來，不能不一半歸之於宋明大儒與忠勇之士的倡導，但另一半，卻是在勝倭夷經過中錘鍊而來的結果。

本章主要參考書誌論文

陳懋恆 明代倭寇考略

黎光明 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

元史

明史

浙江通志

第九章 近代忠義之鄉與人文的淵藪

忠義之鄉的由來

浙江於南宋時，奠爲國都，一時乃成純漢人政治中心所在之地，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竭智盡忠，雖無救於南宋的覆亡，但其流風餘韻存於浙江者，所在多有。浙江著稱於近代史上，非僅在其山水的秀媚，尤在其民族精神的磅礴。南宋承北宋之風，理學最稱昌明，儒家中心的思想，由說經而移於論道，朱子上接孔孟，二程窮理致知，重道問學，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其學頗行於浙江，所著通鑑綱目，標舉正統的大義，維護名教於亂世，對於夷夏之防，忠義之倡，至爲有功。朱、陸兩派之外，在浙江者有永嘉學派，葉適、陳亮爲之中堅，又稱事功派，痛於金人之禍，仲古經攘夷之義，每思建立功業，楮柱乾坤，以一雪中原之恥，金履祥爲此派的後勁，當蒙古軍圍襄樊時，建議朝廷，自海道圍燕，壯志深謀，事雖不成，有足多者，而汪水雲的詩詠亡宋，謝皋羽的痛哭西臺，對於民族思想，大爲伸張，他如

陸放翁的中興鼓吹，唐玉潛的歸喪六陵，對於忠義之風，更多揄揚，有明之恢復全國，頗基於此。建文之變，方正學（孝孺）不憚胥鼎鑊，赤十族，以抗一世英鷄之主的明成祖，土木之變（一四四九年）于忠肅獨力支撐國家民族的安危，敗也先，反上皇，乃因庸主昏憤，奸臣播弄，以至死於刑慘，然忠義之氣，震鐸古今（于慕在杭州）宸濠之變，王陽明以一介書生，奮起殺賊，不顧利害，終戡大亂，此皆浙士忠良，爲國貞幹，且王陽明功既在當世，良知學尤能影響後世和東隣，以書生而效命疆場的精神，給予明末清初的匡復運動，以無窮的與奮之力量，更由前一章中的末節，得知以長期倭患的結果，使浙民自選輾而趨於剛健，始衛鄉而終於保國，凡此皆非來自無由，而實淵源既久。

明末的浙江匡復運動

自崇禎死賊，三桂揖盜明室宗藩，齟起於大江以南的有：南京弘光、福州隆武、肇慶弘軀，時人目爲三王。其在江浙之間而予清兵以一大威脅的，則爲魯王之據紹興，與浙人之團結義勇保守城邑。清兵既陷南都，浙江各地義師雄起，自紹寧以至台處，山寨相望。金華孫嘉績、朱大典、寧波錢肅樂、張煌言，皆糾師勤王，一時之視死如歸爲明殉烈的更所在多有，如祁彪佳、劉宗周、王毓蓀、潘集、周卜年

(以上山陰) 鄒欽堯、王瑞楛、葉時尙(以上永嘉) 陳爾輝(臨海) 余煌(浙籍) 等或投水或仰藥，或絕粒，莫不從容赴義，而慷慨蹈難，力竭而死的，尤以張國維(東陽) 張煌言(鄞縣) 爲著稱。

張國維奉魯王，清兵渡錢塘江，魯王逃至舟山，命國維守四境，國維奉命後，以無船可渡，不能從王，就回到東陽練兵，謀再舉事，及清兵破了義烏，國維知事不可爲，乃投水死，其絕命詩云：「艱難百戰載吾君，拒敵辭唐氣勵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伴孝陵墳。」張煌言與鄭成功會師北伐，所戰皆捷，長江以南，幾全收復，後因鄭成功不能戮力合作到底，中途遠颺，以致煌言孤軍不支，終告失敗，逃至南田的縣嶼地方，清廷多次勸降，終歸無效，乃以詭計擒之於舟山。煌言久以甯台爲根據地，與清兵相持者十多年，餉精多糧寧郡，所以他自鄞遞解赴杭出城時，向郭門拜曰：「某不肖，徒負故鄉父老二十年，有負屬望！」道旁觀衆皆爲流涕，足徵其忠義激厲人心之深，和浙東人士綱蘊民族思想之遍。煌言絕命詩有句云：「身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人臣事，何必千秋青史傳。」

其集團抗清慘壯死難的表示，又有兩起：一在定海，順治八年(西元一六五一年)清兵破定

海，諸臣自張肯堂以暨士兵死者凡萬餘人，一六五六年，清兵再至定海，明臣死者又百餘人，稽死者數有萬八千人之多，上而妃嬪師傅，侯伯，下而紳耆，婦孺，走卒，其中雖不盡爲浙人，而地屬浙土，浙人必多，即使無關守土之責的人，但皆同抱亡國滅種之痛，慷慨赴難，以身殉國。一在四明山，清師既至浙江，魯王走海上，其臣張肯堂、張名振等，出沒浙海，攻據沿岸各地，而與之桴鼓相應的，則有寧、紹、台三屬內地之山寨繼起，大小友軍以百數，互爲犄角，中以四明山王翊（完助）一支爲最堅強，雖數遭清兵擊敗，猶屢挫屢起，先後舉事四次，屹立東南一隅，至十數年之久，此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精神，真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清代浙土的興滅繼絕和守先待後

國內匡復既已不成，又有漂泊異國初思效申包胥乞師以復國的朱舜水，終於宣儒教而化日俗，生前曾曰：「胡運一日不終，一日不願歸葬中國。」其志可哀，其節可仰，繼之者又有張非文其人，庶其鄉賢朱舜水之遺志，並謀托思宗遺孤於海外（詳見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三卷二期）「明末潛渡日本之張非文」一文，皆以乏隣國之可賴，遺骸萬千。而在國內一班最先馳驅呼號，希望以實

力光復舊物，終於衆寡懸殊，橫生變故，志不獲遂的人，以及繼而明社既墟，東南盡在八旗武力統治之下，欲謀愜復，而大勢既去的人，乃先後講學著述，一以激發民衆民族觀念，一以遍詔後世，永嚴夷夏之防，蹀東南各處皆有，獨以浙江爲盛。黃梨洲實爲之先導，梨洲於清初起義江上，乞師東土，兩告失敗，乃聚徒講學，誠如彼在自序行朝錄中所云：「其魂魄不肯盡爲冷風野馬，」有志國史，寓黍離麥秀之痛，病明慘亡，倡明體達用之學，集中更多碑版之文，於國難諸公，表章不遺餘力，實開民族思想浙東史學的先河（今浙江大學新建舜水梨洲兩館以紀念先賢）。萬季野從梨洲遊，而傳其史學，致痛於亡國的慘禍，時思故明的恢復，乃專志於明史，加以季野先世，盡皆忠勇之士，爲明中興勳臣，季野守先待後，遂以文史代戈矛，以布衣隱忍史局，二十年如一日，奮獨力成明史，梨洲行朝錄的旨趣，得季野而發揚光大。至若清初以講學修史而罹文網之禍的，在浙最多：莊廷鑑的明史輯略中多觸諱之語，以至牽涉而死的七十多人，呂留良不仕清朝，一生藉文字鼓吹民族觀念，以攘夷狄救中國爲主題，沒後雍正與曾靜獄，牽涉留良，閩門被禍。再後於徵存文史之中，努力忠烈表章，以維此一脈正氣者，則有邵念魯的東南西南紀事兩種，和明遺民所知傳。全祖望私淑黃萬，尤切故國之痛，發憤整理鄉邦文獻，對於遜迹大儒，死難名臣，乃至一介忠義之士，靡不爲之搜羅編輯，毋使陵夷，後

人讀其遺著，每多與感，而此種志慮，在浙江一隅，更能薪傳不絕，終致復我故土，清末奔走革命的如徐錫麟、秋瑾之死事，章太炎之繫獄，皆與遠紹先烈肇建民國有關。

鴉片之役的浙江死難之士

清道光中，英人以保護鴉片的貿易，而向中國用兵，二十年，北犯定海，六月五日以艦二十六艘駛入定海，中英之間遂行開仗，中國以承平日久，倉卒應變，所以終告失敗，一時守土將士，自知縣姚懷祥以次，皆以身殉，二十一年二月，英人歸定海，八月又來犯城，總兵葛雲飛（山陰）王錫朋、鄭國鴻力戰而死，英人更陷鎮海、寧波，浙東振動，二十二年和議成，訂了近世中國第一次不平等的條約，次年，方始歸還定海予我。

明清兩朝浙江人文的統計

自南宋以後，依丁文江統計，浙江人才數字，常居全國第一位，有明一代人才，浙江占百分之二四·五，江蘇占百分之一三·六，居第二，清代則與江蘇異位，改居第二位（梁任公臆舉清代二十

省學者四六一人，浙占九〇人，張耀翔統計清代進士及第者三四二人，浙占八一人，朱君毅依「著獻類徵」加以分類統計，綜所列人物五九八六八人，浙江凡九一六八人，占百分之十四·九二，次於江蘇之百分之二三·五，湖南之一五·九三，但以清史列傳所採人物統計，則浙江於儒林、文苑、循吏皆居第二，大臣居第三，其總計浙江占百分之一七·三，亦次於江蘇之百分之二一，而居第二，清四庫全書是中國古籍一大結集，考其撰人的籍隸，而分省統計之，亦可以知浙江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毛春翔編四庫著錄浙江先哲遺書目，所載凡四庫入錄的七九六種，一六〇三七卷，又不分卷者九種，附存目者一五〇五種，二九〇六一卷，又不分卷者一一三種，綜計著錄種數占全書四分之一而弱（四庫全書著錄書三四五七種，七九〇七〇卷，存目六七六六種，九三五五六卷），卷數占五分之一而強，存目種數亦居全書存目總數百分之二十二，卷數占百分之十七，此統計伸於明前而止於清初。章乃藻作兩浙科第表，起順治三年，迄光緒二十九年，計二三五度，浙江共得狀元二〇，榜眼二九，探花二七，傳臚二八，會元三一，解元一一〇，而浙西為尤盛，誠可視為人才的重心，文化的淵藪。

文學藝術成績的一斑

明初散文作家，首推宋濂，其次有劉基、王禕、方孝孺諸大家。池北偶談云：「劉文成（基）爲謀臣之首，宋文憲（濂）爲文臣之首，方正學（孝孺）爲忠臣之首，于忠肅（謙）爲功臣之首。」詩則亦以劉基爲越派之首，其後方正學、徐渭、王陽明等皆能作詩。詞則遠溯南宋，如陸放翁與辛棄疾同爲南宋初期的二大作家，高觀國、吳文英、周密、張炎、朱淑貞皆精倚聲。元代以曲爲最盛行，絲元代作曲名家，約九十人，浙產有二十餘，永嘉高則誠所作的琵琶記，與王實甫的西廂記，並稱南北雙璧，小說亦自元而盛，錢塘羅貫中所作水滸傳，爲近代說部首創，幾於家喻戶曉。明代戲劇小說皆盛，尤以傳奇爲特色，王國維曲錄所舉，傳奇作家出於江蘇的三十四人，出於浙江的四十七人，其中高濂的玉簪記、汪鏞的春籟記最著。小說則有吳承恩的西遊記。明末遺民以文史代戈矛，具見前述，黃梨洲爲開山之主（浙東史派），繼之者有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齊召南諸人，迄於晚清，名家倍出，如俞曲園、黃以周、孫貽讓爲考證之後勁，王國維、章太炎爲經史之殿軍。文學之士則有朱竹垞、查慎行、厲鶚、袁枚、龔自珍、姜宸英，科學初則有李之藻、楊廷筠，諸可寶時人傳三編序目，所舉羅士琳、項名達、徐有壬、戴熙、顧觀光、夏鸞翔、鄒伯奇、李善蘭八家，浙居其五。言乎藝術，兩宋以降，代有名家，未有馬遠、夏珪、錢選、元有趙孟頫、管夫人、夏迪、王冕，明有徐渭、戴進、藍瑛、陳洪綬、呂紀，清有董邦達、戴熙，當其中

葉，滬上推三熊，皆浙江人（張熊秀水人，朱熊嘉興人，任熊蕭山人）。其他尚有任熙、吳滔、陳元升，皆著聞於世，吳昌碩爲之後勁，更斐聲域外。

近代藏書印書之中心地的浙江

兩浙爲魚米之鄉，人物殷阜，明清以來，藏書之家甚多，親於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由浙江採進之書爲最多。四庫全書修竣，因江浙爲人文淵藪，特建立三閣於揚、鎮、杭三地。洪楊之亂，江蘇兩閣被燬，僅杭州文瀾一閣歸存，歷年補鈔，得稱完璧，私家藏書之盛，冠於各省，如山陰祁氏（承燦）之澹生堂，仁和趙氏（昱）之小山堂，慈谿鄭氏（博）之二老閣，鄞盧氏（址）之抱經堂，錢塘吳氏（棹）之瓶花齋，鄞徐氏（時棟）之煙嶼樓，錢塘丁氏（丙）之八千卷樓，歸安陸氏（心源）之皕宋樓，然不久皆書散樓空，爾宋樓且爲日本以六萬金並金石拓片捆載以去。今日魯殿靈光，矗立於兩浙者在，浙東則爲鄞天一閣，在浙西則爲南潯嘉業樓（一度散失，今歸浙大文學院），猶能保存一代文獻，係書林重望。

至於鐫板印書，浙人沈括夢溪筆談，以爲自馮道始印五經，吳越繼蜀本而起，今以五代錢氏所

刊之陀羅尼經（一湖州天寧寺本，一杭州雷峯塔本，距今幾及千年）爲浙東最古印本，宋代永嘉陳玉文刻玉臺新詠，又臨安尹氏，同爲浙江私家刻書最早的。杭州於宋時爲鏤板最佳之地，趙希鵠洞天清錄云：「宋時鏤板之地有三，吳、越、閩，以杭州（所謂越板）爲上，福建（所謂麻沙板）最下，其他蜀本亦負名。」夢溪筆談又稱宋仁宗慶曆中（約在一〇四四年），有布衣畢昇爲活板之事，畢昇想括鄉人，故有宋一代，各種印刷事業，相繼而興，杭州一地，乃爲全國出版業的中心。我國最早刻書據今所知，爲白香山、元微之的詩集，皆爲浙江刻本。其實北宋汴都大學的監本，大半皆在杭州雕板印行。元代國都雖北遷，而官書仍多在杭州雕印，因是在杭州、紹興等路，設局刻印經籍。明清兩代，杭州官書局始終不廢（清末併入省立圖書館）。明時杭州又爲四大集散地之一（其他三地爲燕京、金陵、蘇州）。其刻工自明中葉以後，方始可考，皆屬徽人（插畫之工，尤非徽人不辦），則以徽州有木材，有世傳的緣故，故在浙言，爲借材異地，而在地理形勢上言，則同一流域，其關係非此一端，經濟、移民、文化等等，皆具有密切的係屬存乎其中，則爲研究浙史者所不可忽的一點。

本章主要參考書誌論文：

陳訓慈

談浙江文化問題

杭州民國日報二十三年元旦特刊

章乃堯

清代兩浙科第表

文瀾學報三卷一期

文瀾學報——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載

魯 遊 浙江學術源流考 大陸雜誌一卷二期

陳安仁 中國近世文化史

浙江通志

近代忠義之節與人文的淵藪

第十章 承平日久的浙江及其現勢

清代浙江的治亂

自清廷以武力摧殘東南民族運動後，浙江自斯以降，在全國中可以算做一個比較承平而得興盛的省區。清初康、雍、乾三朝，百餘年間的生聚，又使浙江恢復了明初的富庶，人口增益，財力日闢，所以政治重心雖在北京，但經濟重心仍在江南，至清代而倍爲顯著，乃特爲立國命脈之所寄。黃河流域的一省，其人口財力，往往不及江浙一府，所以清初諸帝，對於江浙兩省，壓迫和羈縻的雙管齊下政策，施行得不遺餘力，如蠲租，免欠，如康熙乾隆之多次南巡，如旗兵駐防於杭州、乍浦，如建文瀾閣於西湖，恩威並濟，以維統治。不過浙江雖比較的承平日久，但大的變亂，亦有下列兩次：

(一) 蔡牽海上之變——乾隆嘉慶間，所謂鳳尾幫、水澳幫等海寇，受安南的利用，出沒東南海岸，爲商民患，五年六月海寇船百餘艘，聚福台州，將要登陸，但爲定海總兵李長庚所擊破，八年蔡牽

併水澳，鳳尾餘黨，赴普陀進香，及到定海，又爲李長庚所敗，然牽終以疆臣腐敗，一再坐大，佔據台灣，欲效鄭成功故事，又爲李長庚率浙師三千所敗，其後李長庚雖死，而蔡牽亦不能振，十五年，其黨遂爲清兵所消滅。惟此變僅在海上，對浙江影響甚微。

(二) 太平天國之役——道光三十年（西元一八五〇年）洪秀全、楊秀清起事於廣西，繼出湖南，沿長江而下，爲勢極盛，咸豐三年陷金陵。六年，石達開、李秀成、李世賢先後侵浙，與清兵爭食，奄有全浙。清廷以左宗棠負責規復全浙，繼而太平軍內闕，爲勢乃蹙，左宗棠遂得於同治二年，先後克復浙江各地，彼攻富陽、杭州，並用法兵、洋槍隊，今杭州松木場，尙有法塲的京觀。三年，浙境完全底定，綜計十年之中，洪清兩軍馳逐浙江各地，使浙江遭受很大的摧殘，人口財富，大爲減削，如杭州人口減少百分之七十五，吳興、嘉興、長安、餘杭及其他浙西地方，人口皆有巨額的減少。浙東一部以及江西、安徽、湖南各地移民，一時移入很多，使人口發生很大的移動變化。又如各地農村的破壞，致使村舍無烟，大地茫茫，而城市建築的燬滅，文物書籍的失散，更無從予以統計，他如長安、嘉興米市的破壞，而代以湖墅與硤石，湖州於亂後以絲代亂前綢的輸出，皆爲考究浙江近代經濟變遷中的重要事項。但自斯以後，及今八十年間（民十三的齊盧之戰，大抵在浙境外）浙江又安，鮮遭兵事。

惟自此抗戰軍興後，浙西十餘縣，竟淪敵手，杭州且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陷，浙西居民，又重遭三百年前倭寇蹂躪的慘劇。

浙江在清代的對外貿易

中國對外貿易，自明中葉以倭寇大肆擾邊的緣果，直至鴉片戰時，大抵屬於閉關時期，康熙三十三年，一度開禁，設浙海等權關四署，其時英國和我國貿易，已占首要地位，英船駛至廈門，有時北泊舟山，因移寧波海關於定海，三十七年，在定海城外道頭街西，建紅毛館一區，以安置甲板小梢人等，一七〇一年，東印度公司以貨遭重課，不願交易而去。其後直到鴉片戰爭，中國對外貿易，皆限於廣州一地，及至鴉片戰後，舟山羣島，既與英約有不得割讓他國之約，寧波亦在南京條約中規定爲通商的五口之一，其後光緒二年，溫州以中英烟台條約，二十一年杭州以中日馬關條約，相繼開爲商埠，三地分別於所簽約的第二天，實行開放，不過三地商業，皆以港口不佳，距滬太近，商業不甚發達。惟總理在實業計劃中，曾擬於乍浦、澉浦間開一東方大港，以代替上海，此兩地自宋、元以來，皆曾爲通商的重要口岸，歷時七八百年，他日浚開成功，當不難更盛於昔日之繁華和利便。最近試勘錢

塘江通行輪船，已先後三次，據所得的結果，爲按日隨小汛江湖航駛吃水六公尺左右及每屆舊曆初三、十八隨大汛江湖航駛吃水九公尺左右的汽船，尙堪勉強通航。現擬計實現通航，其航線應以杭州爲起點，惟最重要之航線當爲本省的寧、溫兩地。

浙江人口產業的統計

浙江十一府，自明洪武後，方告確定，所以統計數字，明後始可按覆，以與今日比較。嘉靖浙江通志所載全省人口五、一八三、六六四（約當十六世紀中），康熙四十年賦稅全書所載人口計二、七四三、九〇九（西元一七〇一年），時後五十年，而人口減半額。雍正九年，人口計三、二〇九、四六六（西元一七〇九），視前稍增，民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所載全省人口二〇、六六三、七五四（西元一九三三年），雍正九年至民國二十二年間，共二百二十五年，人口增加六倍半。浙西及錢江兩岸，爲人口稠密之區（全省以紹興一縣，爲人口最密之區，遂昌爲人口最少之區），舊處、台、嚴等屬，人口較少，浙江除錢塘江外，其他河口三角洲皆有肥沃的小平原，雖面積不廣，而人口稠密，至內地及西北角，人口則稱最稀。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各報載內政部人口局發表全國戶

口統計，全國人口統計共四六一、〇〇六、二八五人，浙江人口一九、九四二、一一二人，男一〇、五九五、一二一，女九、三四六、九九一人，視十年前爲減。又同年一月三十日民政廳的統計，抗戰期間，人口有變更，其消長情形爲：十七年二〇、六二七、六五三人，二十四年二〇、八八五、九二九人，二十七年二一、五六〇、〇八五人，二十八年二一、八一八、六五七人，二十九年二一、八三七、八六八人，三十年二一、四九二、五二〇人，三十一年二一、七六二、二四八人，三十二年二一、五四七、六八四人，三十三年二一、一五七、〇〇九人，三十四年二〇、四二七、三〇四人，三十五年一九、六五七、五五一人，以上統計以民國二十七年與三十五年相較，減少九〇二、五三四人，佔百分之五，此係人口他遷和戰時死亡所致。全省人口最多的市縣，首爲紹興，有八二五、九三三人，次爲永嘉七六九、五六九人，再次爲平陽七〇九、四四五人，人口最少的爲分水，僅四二、一七一人，次爲武康人口五〇、一〇二人，再次爲於潛五九、六〇九人。

農田面積，浙江通志載雍正十三年實在田二六、二三二、二〇六畝，國民政府主計處二十一年所估計者，爲四一、二〇九、〇〇〇畝，視前約增三分之一。但後者仍僅佔省區全面積的四分之一（浙江全面積據翁丁、曾三氏推算爲一一〇、六一〇、〇〇〇畝。）主要產物爲米

(浙江省農村調查據浙建廳估計，年產約三千八百萬擔，僅夠全省消費量的四分之一) 棉(二十一年統計爲四十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四擔，爲全國九產棉區中之一省，佔全國百分之四、五一) 絲(全省各縣產絲的計五十八縣，每年約產乾繭百二十萬擔，生絲八十九萬擔，論地位居全國之首位，論成分佔全國總額三分之一) 茶(全省產茶區域有六十二縣，產茶面積約九十餘萬畝，每年平均有二十餘萬擔，在全國茶葉出口額中，所佔的百分比自百分之十六——如一九一五年——乃至六十八以上——如一九二〇年) 紙(浙江所產的手工紙，佔全國產紙額五分之一，年值銀二千萬元，產紙區域有四十二縣之多，工人達十二萬餘) 其他如桐油、魚鹽以及採鑛紡織等等，既占重要的經濟地位，並有悠久的歷史沿革。

幾種重要產品的沿革

(一) 蠶絲棉織——中國養蠶，傳說甚古，浙江當唐宋之世，養蠶已爲浙西各地農家普遍而重要的作業，吳興掌故載稱：「湖人養蠶看火，都聽命於天時，而古法則以人力勝之，立蠶室，節寒暖，以是蠶桑之法，莫勤於湖民。」惟昔時遍身綺羅之人，皆爲帝王、官吏、士紳之流。織造則淵源於春秋之

世，古歌有「女工織葛不敢停」之句，唐前杭州綾紗，紹興越羅，已著盛名，宋設織造院，上貢宮廷之用，其時國勢孱弱，年藉綾羅爲媵和遼金之資，明清因之，於杭州設立織造專局，製成各種絲織品，湖縐杭紡，乃馳名於國內外。

(二)冶鑛鑄造——周禮載揚州稱「其利金錫」，漢書食貨志：「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江南之產金類，久著國內，其後歐冶鑄劍，劉渾冶銅，載在史冊，唐時於睦州銅官山置官開採。唐書地理志：龍泉縣銅山出銅，松陽縣產銀鉛，宣平縣產鐵。又瑞安、平陽、泰順三縣皆產鐵，以力艱工苦，明予以罷滅。永樂中，又採平陽銀鑛，百餘年而停。觀於宋代坑工爲亂，與明代坑工禦侮的記載，人數多至盈千累萬，可以推知採冶之盛。

(三)釀造製茶——釀造中以酒爲最重要，溯其製造的緣起，相傳始於杜康（周人）花醞著稱於晉，銀瓶裝山陰甜酒，名馳於梁，越酒、蓬萊酒唐代採入酒經。名酒記仿酒經而作，載秀州有月波酒，明州有金波酒，越州有蓬萊酒，金華有金華酒，處州有谷簾酒，皆具盛名。南宋建都臨安，宴遊之餘精究釀製，如流香、百花春、香山等酒，稱開當時。明代佳釀更多，而尤以越酒風行全國，名老酒者特行，至今依然，每年出產約在四千四百餘萬斤，銷行全國。唐代陸羽，鬻茶者視爲茶神，所著茶經三卷，爲中

國最早與最佳的評茶專著，書中品題浙茶者，有天目茶、顧渚茶，而浙西以湖州稱最，浙東以明州爲上。又紹興的日鑄茶，歐陽修稱：「兩浙產茶，日鑄第一。」惟近代則以杭州的龍井茶，紹興的平水茶，馳譽中外。

(四)造紙製瓷——魏晉之世，浙江越紙已有剡藤、側理之名。又經書法家王羲之的提倡，越紙名滿天下，隋唐以來，敕建多寺，南宋偏安，藻繪尙文，因之製紙造牋，日以興盛，明清因之，其中如常山、仙居所產的奏本紙，餘杭、龍游所產的竹燒紙，溫州的蜀紙，鄞縣、奉化、安吉的皮紙，桐廬、常山的曆日紙，均著聞於時。而浙省錫箔，明時獨杭城一地，造者已有萬家，近代乃集於紹興。浙江產瓷見於記載的，在晉曰縹，在唐曰越，曰祕色，曰婺州。宋南渡後，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窰，模範極精，爲世所稱。其時龍泉有章生一生二兄弟，各主一窰，分別稱哥窰與龍泉窰，後者所產極爲青瑩無瑕，如美玉然，前者所產，皆淺白斷文，號百圾碎，亦冠絕當時。除上所稱敝者外，其他如西湖、湘湖的蓴菜，嘉興的李、濮院的紬，善璉村的筆，寧波的花邊業和木器，黃岩、溫州的橘，桐廬的鱸魚，平陽的罨，青田的銀與圖書石，寧溫的草蓆，餘姚等地的草帽，奉化的竹刻，杭、寧等地的紙傘，杭州的紙扇，香粉和剪刀，天竺的竹筷等，或以土地特宜，或以世代相傳，要皆歷有年所，饒多變遷的痕跡，雖無關於根本，但卻可以由之以爲

視知歷史、人文、經濟大勢之一助。

近年來的建設成績

近年浙江以在國內各省中，爲比較承平的省分，加以交通便利，人文發達，所以一切建設事業，亦每能在各省中樹之先聲，多所成就。舉其荦荦大者，則有西湖博覽會和浙江文獻展覽會的舉行，有浙贛路杭江段和錢江大橋的建造，有寧紹人士在上海金融界的建樹和省內人士在國內政黨各界的獻替，凡此諸端，不僅是關係一省之事，而且關係一國之事，茲分敘之以殿本文：

(一)西湖博覽會與文獻展覽會的舉行——世界之有博覽會，始於一七九八年法國拿破崙之舉行，中國舉行最重要的展覽會，則爲宣統二年在南京舉行的南洋勸業會，而西湖博覽會則後來居上，比之前者有過之無不及。西湖博覽會動議甚早，迨十七年北伐告成，南北統一，浙江省政府因復籌劃舉行，十八年六月六日，開幕於杭州西湖，凡所徵集出品，以國貨爲限，其出品人亦以本國籍爲限，計分染織工業、工藝品、電機工業、化學工業、礦產、醫學用品、教育用品、文藝品、農產、飲食製品、動物、革命紀念品等十二大類。出品陳列於革命紀念館、博物館、藝術農業館、教育館、衛生館、絲綢館、

工業館，特種陳列館，參考陳列所等十大館，爲空前盛會，開會四閱月，參觀者數十萬衆，一方得以領略湖光山色的佳趣，一方得以研究農工實業發達的真象，而對於會中物品，予以一切實研究考察，以圖改善推廣的方法，尤其對於浙江的製造業，給予一很大的激勵。其後七年（民國二十五年）又有浙江文獻展覽會的舉行，於是年十一月一日，開幕於杭州省立圖書館，事前向省內外公私藏書家廣事徵借本省圖書文物，總計應徵凡三百餘戶，徵件總數達二萬餘件，六千餘種，甄別類分，入室陳列，先後十八天，參觀者幾達八萬人，且有許多人自京、平、滬各地，特地來杭參觀的。展覽文物共分十二室陳列，依次爲鄉賢遺書，選舉文獻，刻書與藏書文獻，浙江方志，鄉賢字畫冊頁，鄉賢字畫立軸與手卷，吳越錢氏文物，鐘鼎彝器，金石字碑，鄉賢遺物或手製珍玩，民族革命文獻，畚民文獻等。此兩度博覽會，一橫一縱，不啻爲今昔浙江人文所成就的結晶品作一總校（文獻展覽會會場前懸一長聯爲：「文章昭日月，萃杭秀湖婺睦衢明台溫處十一州精華，闡爾幽潛，詎日尙論前古事；忠義壯山河，絲周秦漢吳晉隋唐宋元明清二千年掌故，資人觀感，佇看振起後賢心。」尙富意義。）

（二）杭江路與錢江大橋的建造——考我國內部所有鐵路的建造，可以列爲清末與抗戰前後兩階段，而抗戰前後一階級的鐵路建築，則以浙江之杭江鐵路（今浙贛路之浙江部分）爲始

點。北伐成功，浙江省局粗定，民樂其業，益以歷任主政人員，銳意圖新，力謀建設，故如公路、鐵路、電話、航政、水利、工商、農墾，皆頗經營，略具基礎，其中又以杭江路的建築為可稱美。浙江因天然形勢，分為浙東浙西，浙西平衍，水陸交通皆稱利便，浙東寧紹兩屬，運輸尚便，至如金衢一帶，則山嶺起伏，溪流狹隘，運輸至感困難，所以浙東的物質文化和企業發展，均難與浙西並駕齊驅。民國十六年，張靜江氏主浙，乃計劃建築杭江（杭州至江山）鐵路，原為浙省出資經營，因省庫的支絀，力求建築費的撙節，初採用三十五磅的輕軌，後皆換用重軌，分江蘭、金玉兩段先後興築，江蘭段起於杭州對岸的江邊——西興，直達金華，而至蘭谿，全長一九五公里，共用建築費約七百二十餘萬元，其中除國內銀行團息借半數外，餘均為省庫撥給，自民國十九年三月開工，至二十一年三月通車。金玉段起自金華至江西之玉山，全長一六〇公里，共用建築費約六百九十萬元，其中省款六十五萬元，借用中英庚款購料二十萬金磅（合國幣三百二十一萬元）四銀行息借三百一十萬元，自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開工，至次年同月通車。繼鐵道部與浙贛兩省府及社會熱心開發交通的人士，共集議組浙贛鐵路聯合公司，建築玉萍鐵路，先築玉山至南昌一段，全長二九二公里，自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開工，至二十五年一月通車，南昌至萍鄉一段，全長二六二公里，自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興工，次年六

月通車。(改稱浙贛路一度與粵漢湘桂行駛直達通車三日夜可畢全程。)聯成長江珠江間一大東西行的幹線，而杭玉段以四萬元一公里的建築費而成，其數字之小實爲全國鐵道史的新記錄，且自浙江開發的歷史言之，亦爲一重要的事件。但錢塘一江，劃分東西，烟波浩淼，全恃渡船（考錢江義渡，亦有一段不可埋沒的歷史，開始於清同治三年，其時太平之役，方告終了，杭州胡雪巖氏以錢江渡船舟小人多，時遭覆溺，於是捐資一萬千文——約抵今一萬元——設立義渡，渡江不取分文，光緒二十年，有帆船三十七艘，車八輛，牛十六頭，雇用舟子三百餘人，並設錢江義渡局，專管此事，在潮落水淺，渡船不能直達兩岸時，則用跳板，或牛車渡過，又在南岸江邊到西興，築一長堤伸入江中，廣凡十尺，長有千餘丈左右，行旅稱便。民國八年，又購置煤油輪兩艘，拖帶渡船，十三年杭紹甬三地紳商，出資購贈柴油輪四艘，於是完全改爲輪渡。十八年北岸浙江第一碼頭完成，更爲便利。帆運時期，每日祇有二三千人來往，改用輪運後，平均每日在一萬六千人以上，「一二八」時每日渡客竟達四萬人左右，每年總計約有六百萬人渡江。）經濟時間兩不合算，而近來如杭江鐵路的通車，七省公路的修築，以及滬杭甬路的即將完成（按該路於「八一三」後已成又毀，免資敵用，現又積極恢復，預定明年六月全線——浙贛——即可通車，行見浙鹽贛米盈虛相濟，更以此江南大動

脈連接了粵漢路，貫通浙贛湘鄂粵諸省，屆時可由上海乘車逕到九龍，杭甬線亦擬恢復。）無一不與錢江有關，所以若能在錢江上築橋，聯貫通車，不僅浙省經濟文化賴以發展，即全國交通國防亦有莫大關係。乃由曾養甫氏倡議，先後組織委員會，計劃籌措，二十三年四月成立錢塘江橋工程處，復經多次查勘，擇定以杭州六和塔為錢江北岸的建橋地址，橫越河身，以達南岸，分為正橋及引橋兩部分，總長一千四百公尺，正橋分十六孔，每孔六十七公尺，北岸引橋長約二百三十五公尺，南岸引橋長九一·五公尺，橋為雙層式，上承公路，下載鐵道，鐵道淨空計高六·七〇六公尺，寬五·一八二公尺，路面寬度，計公路六·〇九六公尺，人行道各一·五公尺，路面及橋墩為鋼筋混凝土建築，北岸鐵路經虎跑山谷，繞過烏芝嶺，再經江干與滬杭甬鐵路接軌。公路：一由虎跑通湖濱，一過橋登山接杭富公路。南岸鐵路公路皆趨西與浙贛鐵路、滬杭甬鐵路及浙東各公路相啣接。經費六百萬元，於二十三年十一月開工，二十六年「八一三」事變後完工，偉俊喬皇，為我國近代最大工程，於湖光山色之中，成此一新時代的建築，互相配合起來，益呈壯麗之觀。可恨方告成功，而杭垣告陷，為求免資敵用，遂予以破壞，但對於我們資源的撤退，人民的南下，為時雖暫，卻已裨益不淺（按現已恢復）。

(三)浙人對國內金融政治等方面的獻替——這裏作者特別提出金融一方面事，且限於上海一埠爲言，因爲上海爲近代中國金融中心的緣故。寧、紹等地，所謂濱海之人，既以網罟爲耕耘，復以商殖爲專利，加以其人沉毅、果敢、質樸、耐勞，重然諾，尚信義，施之於錢業，遂令自始至終，皆爲所謂寧紹兩幫的努力與成就，和徽人興業，晉人票莊，並名於世。最近上海錢業中，以家數論，寧、紹籍占全體會員總額百分之七十二，以資本言，占全體資本總額百分之七三·四，新式銀行，浙人參與或自設者，亦屬占居首位。又若寧屬七邑人士，在上海一地營業者，數在四十萬以上，其他各省市以及海外各國，靡不有甬人的足跡，故諺有「無寧不成市」的一句話。至於紹興人，在昔日政界上的活動，實可與寧波人在商業上的活動，並稱二難。說到最近浙人在各界的成就，則屬「耳熟能詳」，不煩細舉，柳詒徵氏在浙江文獻展覽會中開幕致辭有云：「運會所極，紛攘二十年，從河山破碎中，持文教、實業、黨治、軍力，奔走搏控天下，亦惟浙之英傑。」浙江之於中國，愈至近代，愈見重要，此非個人的諛詞，實爲歷史之至論。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論文， 陳訓慈 浙江文獻展覽會之回顧

圖書展望二卷二期

杜重道 杭江鐵路

時事新報建設特刊新浙江號

承平日久的浙江及其現勢

一〇五

伍廷恩 浙江省經濟建設之進展 實業部月刊

茅以昇 錢江大橋建築工程報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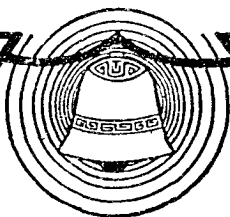
秦潤卿 上海錢業中紹幫與寧幫

國風第八卷第九、十期

浙江省經濟調查

浙江通志

(一九四一年完稿於遵義)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浙史紀要

全一册 定價金圓券肆角柒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李 紱 非

發行人 蔣 志 澄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2550)

校整：龍武

#6

404051

